



国际法委员会

第七十届会议

2018年4月30日至6月1日，纽约；

2018年7月2日至8月10日，日内瓦

特别报告员玛丽亚·莱赫托编写的关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问题的第一次报告

目录

	页次
导言	3
A. 以前就本专题开展的工作	3
B. 大会第六委员会在第七十一届(2016年)和第七十二届(2017年)会议上举行的辩论.....	3
C. 本报告的目的和结构	8
一. 依据占领法保护环境	10
A. 占领的概念	10
B. 通过财产权保护环境	15
C. 通过其他占领法规则保护环境	23
二. 通过国际人权法在占领局势下保护环境.....	27
A. 占领法和国际人权法的互补性	27
B. 环境与人权：健康权	32
三. 国际环境法在占领局势中的作用.....	39
A. 国际环境法的补充作用	39



B. 尽职	40
C. 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	43
四. 拟议原则草案	47
五. 今后的工作	48
A. 将在第二次报告中讨论的问题	48
B. 与完成本专题工作有关的其他问题	48
六. 参考书目选编	50
附件	
国际法委员会或起草委员暂时通过的原则草案综合清单.....	63

导言*

A. 以前就本专题开展的工作

1. 委员会在其第六十五届会议(2013年)上将题为“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的本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并任命玛丽·雅各布松为本专题特别报告员。¹委员会在其第六十六届会议(2014年)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A/CN.4/674和Corr.1),²在其第六十七届会议(2015年)上审议了第二次报告(A/CN.4/685)。³委员会在其第六十八届会议(2016年)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A/CN.4/700),⁴并暂时通过了八项原则草案以及对这些原则草案的评注。⁵委员会还注意到起草委员会在同一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其他九项原则草案。⁶

2. 由于雅各布松女士不再担任委员会委员,委员会在其第六十九届会议(2017年)上决定设立一个工作组,以考虑本专题今后的方向。⁷工作组注意到,已经就这一专题做了大量工作,并强调必须完成这项工作,同时维持和巩固迄今已完成的工作。工作组注意到,除精简、术语、填补空白和案文的总体结构等原则草案的某些方面以及评注草案的完成情况外,还有其他领域可进一步处理。在这方面,除其他外提到了与国际环境法等其他相关国际法分支互补的问题、占领局势中的环境保护、责任和赔偿责任问题、非国家行为体的责任以及将原则草案全面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⁸委员会同意工作组的结论,并决定任命玛丽亚·莱赫托女士为本专题特别报告员。⁹

B. 大会第六委员会在第七十一届(2016年)和第七十二届(2017年)会议上举行的辩论

3. 2016年,第六委员会收到了国际法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原则草案及其评注以及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原则草案。2016年共有33个国家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 特别报告员感谢纽约大学的 Katerina N. Wright、赫尔辛基大学的 Outi Penttilä 和斯坦福法学院的 Rina Kuusipalo 在编写本报告过程中协助开展研究。

¹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8/10),第131段。

² 同上,《第六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9/10),第186-222段。

³ 同上,《第七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70/10),第130-170段。

⁴ 同上,《第七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71/10),第139-189段。

⁵ 同上,第188段。

⁶ 同上,第146段。这些原则草案的案文见附件一。

⁷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0号》(A/72/10),第255段。

⁸ 同上,第259段。

⁹ 同上,第262段。

(红十字委员会)¹⁰ 处理了这一专题，而 2017 年共有 18 个国家。¹¹ 发言者普遍支持这一专题，并强调它的相关性。¹² 在这方面，除其他外提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的联合国环境大会、¹³ 水与和平问题全球高级别小组、¹⁴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¹⁵ 委员会决定继续就这一专题开展工作，这一决定普遍受到了欢迎，若干国家支持继续与红十字委员会、环境署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及其他拥有相关专长的国际组织进行协商。¹⁶

4. 虽然有与会者认为，该专题的范围应限于武装冲突法，¹⁷ 但相当多的与会者支持审议武装冲突法与其他国际法分支、尤其是与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之间的

¹⁰ 奥地利(A/C.6/71/SR.27, 第 106-109 段)、中国(A/C.6/71/SR.24, 第 96 段)、克罗地亚(A/C.6/71/SR.28, 第 41 段)、捷克(A/C.6/71/SR.27, 第 118-120 段)、埃及(A/C.6/71/SR.23, 第 45 段)、萨尔瓦多(A/C.6/71/SR.27, 第 142-150 段)、密克罗尼西亚联邦(A/C.6/71/SR.28, 第 52-59 段)、法国(A/C.6/71/SR.20, 第 79 段)、希腊(A/C.6/71/SR.29, 第 16-18 段)、印度(A/C.6/71/SR.30, 第 20 段)、印度尼西亚(同上, 第 8-9 段)、红十字委员会(同上, 第 21 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1/SR.29, 第 92-93 段)、以色列(同上, 第 99-101 段)、日本(同上, 第 89 段)、黎巴嫩(A/C.6/71/SR.28, 第 16-18 段)、马来西亚(A/C.6/71/SR.29, 第 28-33 段)、墨西哥(同上, 第 75-76 段)、荷兰(同上, 第 2-4 段)、挪威(代表五个北欧国家: 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A/C.6/71/SR.27, 第 90-94 段)、秘鲁(A/C.6/71/SR.30, 第 7 段)、葡萄牙(A/C.6/71/SR.28, 第 32-33 段)、大韩民国(A/C.6/71/SR.30, 第 13 段)、罗马尼亚(A/C.6/71/SR.28, 第 19-20 段)、新加坡(A/C.6/71/SR.27, 第 129 段)、斯洛文尼亚(A/C.6/71/SR.29, 第 50-53 段)、西班牙(A/C.6/71/SR.28, 第 42-45 段)、苏丹(同上, 第 2 段)、泰国(A/C.6/71/SR.29, 第 10 段)、多哥(A/C.6/71/SR.23, 第 20 段)、乌克兰(A/C.6/71/SR.30, 第 2-4 段)、美利坚合众国(A/C.6/71/SR.29, 第 69-70 段)和越南(同上, 第 43-45 段)。

¹¹ 奥地利(A/C.6/72/SR.25, 第 47 段)、捷克(A/C.6/72/SR.26, 第 90 段)、丹麦(代表五个北欧国家: 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A/C.6/72/SR.25, 第 40 段)、萨尔瓦多(A/C.6/72/SR.26, 第 128-129 段)、黎巴嫩(同上, 第 92 段)、马来西亚(同上, 第 119-120 段)、荷兰(同上, 第 37 段)、葡萄牙(A/C.6/72/SR.25, 第 94 段)、罗马尼亚(A/C.6/72/SR.26, 第 28-29 段)、俄罗斯联邦(A/C.6/72/SR.19, 第 36 段)、斯洛文尼亚(A/C.6/72/SR.25, 第 108 段)、西班牙(同上, 第 67 段)、泰国(A/C.6/72/SR.26, 第 60 段)、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加共体)(A/C.6/72/SR.25, 第 34 段)、土耳其(A/C.6/72/SR.26, 第 104 段)、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同上, 第 114 段)、美利坚合众国(同上, 第 8-9 段)和越南(同上, 第 123 段)。

¹² 不过，见捷克(同上, 第 90 段)和俄罗斯联邦(A/C.6/72/SR.19, 第 36 段)。

¹³ 联合国环境大会 2016 年 5 月 27 日题为“受武装冲突影响地区的环境保护”的第 2/15 号决议(UNEP/EA.2/Res.15)表示支持委员会就这一专题正在开展的工作(序言部分第 12 段)。另见其 2017 年 12 月 5 日题为“减轻和控制受武装冲突或恐怖主义影响地区污染”的第 3/1 号决议(UNEP/EA.3/Res.1), 其中“请执行主任继续开展环境署与国际法委员会之间的沟通, 除其他外, 应委员会请求向其提供相关信息, 以支持其在武装冲突或恐怖主义所致污染方面的工作”(第 11 段)。

¹⁴ A Matter of Survival: Report of the Global High-Level Panel on Water and Peace, (2017)。

¹⁵ 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 号决议(A/RES/70/1)。

¹⁶ 马来西亚(A/C.6/72/SR.26, 第 119 段)、葡萄牙(A/C.6/71/SR.28, 第 33 段)、斯洛文尼亚(A/C.6/72/SR.25, 第 108 段)和泰国(A/C.6/71/SR.29, 第 10 段和 A/C.6/72/SR.26, 第 60 段)。

¹⁷ 墨西哥(A/C.6/71/SR.29, 第 75 段)。

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被视为“本专题所固有的”。¹⁸ 与会者还指出，武装冲突期间和之后的环境退化直接影响到人类福祉。¹⁹ 与会者突出强调，需要更加明确“其他国际法如何能为环境提供补充性保护，包括在武装冲突期间提供保护”。²⁰ 在这方面还提到了海洋法²¹ 和条约法。²² 与此同时，与会者强调了国际人道主义法作为特别法在武装冲突中的作用，²³ 有人指出，“委员会不应试图修改武装冲突法”。²⁴

5. 与会者普遍支持选择分时段的办法处理这一专题，但也有与会者指出，可能难以严格区分不同套的原则草案，因为很多原则草案适用于所有三个阶段——武装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²⁵ 一些国家呼吁给“自然环境”²⁶ 这一概念下定义，或澄清原则草案涉及“自然环境”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环境”。²⁷ 另一些国家表示，环境问题不能仅限于自然环境，因为它们包括人权、可持续性和文化遗产，因此倾向于更广义的术语。²⁸ 还有人指出，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不一致，应在后一阶段再作讨论。²⁹ 有人还认为，“不能认为自然环境不同于居住其中并在生计、住所、文化习俗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依赖自然环境的居民”。³⁰ 有人指出，武装冲突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可能对地球的生态福祉和民众生计产生长期的破坏性影响，有可能使多年来得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倒退。³¹ 有人强调了人类拥有安全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³²

¹⁸ 希腊(同上，第 17 段)。另见萨尔瓦多(A/C.6/71/SR.27，第 149 段)、密克罗尼西亚联邦(A/C.6/71/SR.28，第 54 段)、葡萄牙(同上，第 32 段)和泰国(A/C.6/72/SR.26，第 60 段，以及 A/C.6/71/SR.29，第 10 段)。另见马来西亚(A/C.6/72/SR.26，第 120 段)、罗马尼亚(同上，第 28 段)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加共体)(A/C.6/72/SR.25，第 34 段)。

¹⁹ 黎巴嫩(A/C.6/71/SR.28，第 18 段)和乌克兰(A/C.6/71/SR.30，第 2 段)。

²⁰ 红十字委员会(同上，第 21 段)。

²¹ 罗马尼亚(A/C.6/72/SR.26，第 28 段)。

²² 马来西亚(同上，第 120 段)。

²³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同上，第 114 段)和美利坚合众国(同上，第 8 段)。

²⁴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C.6/71/SR.28，第 25 段)。另见荷兰(A/C.6/72/SR.26，第 37 段)。

²⁵ 中国(A/C.6/71/SR.24，第 96 段)、萨尔瓦多(A/C.6/71/SR.27，第 142 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1/SR.29，第 92 段)、黎巴嫩(A/C.6/71/SR.28，第 16-17 段)、荷兰(A/C.6/71/SR.29，第 2 段)、葡萄牙(A/C.6/71/SR.28，第 33 段)和大韩民国(A/C.6/71/SR.30，第 13 段)。不过，见马来西亚(A/C.6/71/SR.29，第 28 段)和西班牙(A/C.6/71/SR.28，第 42-43 段)。

²⁶ 以色列(A/C.6/71/SR.29，第 101 段)。

²⁷ 萨尔瓦多(A/C.6/71/SR.27，第 143 段)和大韩民国(A/C.6/71/SR.30，第 13 段)。

²⁸ 马来西亚(A/C.6/71/SR.29，第 29-30 段)和苏丹(A/C.6/71/SR.28，第 2 段)。

²⁹ 马来西亚(A/C.6/71/SR.29，第 29 段)。

³⁰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A/C.6/71/SR.28，第 54 段)。

³¹ 泰国(A/C.6/72/SR.26，第 60 段)和乌克兰(A/C.6/71/SR.30，第 2-3 段)。

³² 丹麦(代表五个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A/C.6/72/SR.25，第 40 段)。

6. 有人针对武装冲突的分类以及这一点如何体现在原则草案中发表了一些意见。一些国家认为,原则草案不应涉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³³而其他几个国家则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当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普遍存在。³⁴一些国家强调,必须澄清哪些原则草案适用于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或明确指出一套原则草案作为一个整体适用于这两种武装冲突。³⁵有人对在几项原则草案中使用强制性语言表示关切。³⁶

7. 关于原则草案 9[二-1](武装冲突期间对自然环境的总体保护),有人指出,预防措施应不仅力求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损害,而且应力求避免这种损害。有人指出,红十字委员会题为《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研究报告所载规则 44³⁷和预防原则可就如何着手处理预防问题提供指导。此外,有代表团敦促委员会提供更多的资料,说明原则草案 9 第 2 段以及《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害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 35 条第 3 款和第 55 条第 1 款提到的“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这一门槛值的含义。³⁸有人询问关于“指定保护区”的原则草案 5[一-(+)]与原则草案 9 和关于“禁止报复”的原则草案 12[二-4]是否协调及有何相互关系。³⁹

8. 关于委员会已注意到的原则草案,即原则草案 4、6 至 8 和 14 至 18,在关于原则草案内容的初次辩论中,发表了很多意见。这种辩论预计将在以后的一届会议上继续进行,届时,将有随附的评注可用,并且委员会已暂时通过此类原则草案。

9. 一些国家质疑了原则草案 6 提到的涉及土著人民的问题的相关性。⁴⁰其他一些国家支持将这些问题列入原则草案,⁴¹认为土著社区的利益应在武装冲突的各个阶段得到尊重。⁴²会上进一步指出,原则草案应探讨“交战方有义务考虑

³³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1/SR.29, 第 93 段)和墨西哥(同上, 第 75 段)。

³⁴ 萨尔瓦多(A/C.6/72/SR.26, 第 128 段)、葡萄牙(A/C.6/71/SR.28, 第 33 段)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加共体)(A/C.6/72/SR.25, 第 34 段)。

³⁵ 萨尔瓦多(A/C.6/71/SR.27, 第 142 段)、马来西亚(A/C.6/71/SR.29, 第 31 段)、大韩民国(A/C.6/71/SR.30, 第 13 段)、斯洛文尼亚(A/C.6/71/SR.29, 第 50 段)和西班牙(A/C.6/71/SR.28, 第 44 段)。

³⁶ 美利坚合众国(A/C.6/72/SR.26, 第 9 段)。

³⁷ “作战方法和手段的使用必须适当考虑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在进行军事行动时,须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并无论如何,减少环境附带受损害。尽管某些军事行动对环境的影响尚缺乏科学上的确定性,但这并不足以免除冲突当事方采取预防措施的义务”(J.-M. Henckaerts and L. Doswald-Beck,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Rules*, vol. I, ICRC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47)。

³⁸ 希腊(A/C.6/71/SR.29, 第 18 段)。

³⁹ 萨尔瓦多(A/C.6/72/SR.26, 第 129 段)和西班牙(A/C.6/71/SR.28, 第 44-45 段)。

⁴⁰ 法国(A/C.6/71/SR.20, 第 79 段)、印度尼西亚(A/C.6/71/SR.30, 第 8-9 段)、以色列(A/C.6/71/SR.29, 第 100 段)、墨西哥(同上, 第 76 段)、荷兰(同上, 第 2 段)和越南(同上, 第 45 段)。

⁴¹ 萨尔瓦多(A/C.6/71/SR.27, 第 150 段)、密克罗尼西亚联邦(A/C.6/71/SR.28, 第 58 段)和马来西亚(A/C.6/71/SR.29, 第 33 段)。

⁴²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A/C.6/71/SR.28, 第 58 段)。

到土著人民拥有的与其自然环境有关的传统知识和习俗”。⁴³ 还有一些国家鼓励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⁴⁴ 或希望将关注对象扩展到与其所居住领土的环境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类别的人。⁴⁵

10. 关于“战争遗留物”的原则草案 16 和关于“海上战争遗留物”的原则草案 17 普遍受到欢迎，同时提议对其作出一些修改。⁴⁶ 关于原则草案 16，有人指出，该原则草案的范围超过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所附《经 1996 年 5 月 3 日修正的《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经 1996 年 5 月 3 日修正的第二号议定书》)和《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第五号议定书》)的规定。⁴⁷ 就遗留物问题提出的具体意见包括建议原则草案指出将有害物质引入自然的冲突当事方应负责搜寻、清除和销毁其留下的战争遗留物，⁴⁸ 并建议在涉及战争遗留物的原则草案案文中明确提到环境损害和环境保护。⁴⁹ 会上还提出，委员会应重新考虑在原则草案中排除“立即”这一措词的做法。⁵⁰ 有人指出，有些战争遗留物会立刻影响环境，清除这些遗留物方面的任何拖延都有可能对环境造成灾难性破坏，并对人类构成持续危害。⁵¹ 其他一些国家欢迎目前不包含这一措词的表述。⁵²

11. 有人对关于“和平行动”的原则草案 8 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⁵³ 不过，也有人支持该原则草案，⁵⁴ 但认为需要进一步讨论其内容。⁵⁵ 与会者支持关于“武装冲突后的环境评估与补救措施”的原则草案 15，并强调了主管国际组织和机构

⁴³ 同上。

⁴⁴ 斯洛文尼亚(A/C.6/71/SR.29, 第 52 段)。

⁴⁵ 罗马尼亚(A/C.6/71/SR.28, 第 19 段和 A/C.6/72/SR.26, 第 29 段)。

⁴⁶ 萨尔瓦多(A/C.6/71/SR.27, 第 149 段)、密克罗尼西亚联邦(A/C.6/71/SR.28, 第 56-57 段)、黎巴嫩(同上, 第 17 段)、斯洛文尼亚(A/C.6/71/SR.29, 第 52 段)、乌克兰(A/C.6/71/SR.30, 第 3 段)和越南(A/C.6/71/SR.29, 第 44 段)。

⁴⁷ 以色列(同上, 第 100 段)、荷兰(同上, 第 3 段)和美利坚合众国(同上, 第 70 段, 以及 A/C.6/72/SR.26, 第 9 段)。

⁴⁸ 越南(A/C.6/71/SR.29, 第 44 段)。

⁴⁹ 葡萄牙(A/C.6/71/SR.28, 第 32 段)。

⁵⁰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A/C.6/71/SR.28, 第 57 段)。

⁵¹ 同上。类似发言见萨尔瓦多(A/C.6/71/SR.27, 第 149 段)。

⁵² 以色列(A/C.6/71/SR.29, 第 100 段)和荷兰(同上, 第 3 段)。

⁵³ 荷兰(同上, 第 2 段)、美利坚合众国(同上, 第 70 段)和越南(同上, 第 45 段)。另见奥地利(A/C.6/71/SR.27, 第 107 段)。

⁵⁴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A/C.6/71/SR.28, 第 55 段)。

⁵⁵ 挪威(代表五个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A/C.6/71/SR.27, 第 94 段)。

在这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⁵⁶ 与会者支持关于共享信息的原则草案 18，但对其范围提出了意见。⁵⁷

C. 本报告的目的和结构

12. 本报告有两重目的。本报告按照工作组确定的需要在本专题范围内进一步审议的问题清单，首先重点阐述占领局势中的环境保护。正如以往关于本专题的工作已充分证明的那样，有些环境问题需要在整个冲突周期内应对：武装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占领局势也是同样如此。⁵⁸ 当占领是武装冲突造成的后果时，可以认为环境已经遭受了重大损害。此外，武装冲突往往造成体制崩溃，这也影响到环境管理，并妨碍冲突后应对环境问题的努力。⁵⁹ 占领期间一段段时间的密集敌对行动或武装冲突的重新爆发，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和加剧现有环境问题。⁶⁰ 虽然较稳定的占领可能与冲突后局势类似，使占领者得以采取措施，通过对被占领土的环境有利的政策，但有些占领做法可能进一步导致环境退化。例如，占领军和支持占领军的军事基础设施可能会留下环境足迹。军事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损害除其他外可能涉及使用化学品或武器，不恰当地处理或倾倒入有毒或有害废物，或利用自然资源。⁶¹

13. 占领法——1907 年《海牙章程》、⁶²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和习惯法提供的环境保护大多是间接的。除了《第一议定书》，详细阐明占领法的文书早于作为国际法一个单独分支出现的国际环境法，甚至早于作为法律保护主体的“环境”的概念化。占领法规则虽然

⁵⁶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A/C.6/71/SR.28, 第 55 段)、黎巴嫩(同上, 第 17 段)和乌克兰(A/C.6/71/SR.30, 第 4 段)。

⁵⁷ 荷兰(A/C.6/71/SR.29, 第 4 段)、斯洛文尼亚(同上, 第 53 段)和乌克兰(A/C.6/71/SR.30, 第 4 段)。

⁵⁸ 见环境署在受冲突影响国家的环境评估，例如：《关于伊拉克-科威特冲突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的快速评估报告》，第一至三部分(1991 年)；《根据文件编写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环境研究报告》(2003 年)(可查阅：<https://postconflict.unep.ch/publications/INF-31-WebOPT.pdf>)；《根据文件编写的伊拉克环境研究报告》(2003 年)；《伊拉克的环境：环境署的进度报告》(2003 年)；《关于伊拉克环境“热点”的评估报告》(2005 年)；《对加沙地带内以色列撤军地区的环境评估报告》(2006 年)。

⁵⁹ 环境署，《从冲突到建设和平：自然资源的作用与环境》，2009 年，第 17 页。

⁶⁰ 环境署，《对 2008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 月敌对行动升级后加沙地带的环境评估》(2009 年)；《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国际法概述与分析》，2009 年，第 17-18 页。

⁶¹ 见 U. C. Jha, *Armed Conflict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Pvt Ltd, 2014, o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maintenance of military bases, see pp. 174-179. See also D. L. Shelton and I. Cutting, “If you break it, do you own it? Legal consequences of environmental harm from military activi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egal Studies*, vol. 6 (2015), pp. 201-246, at pp. 206-213; and Z. Brophy and J. Isaac,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Israeli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Applied Research Institute, Jerusalem, 可查阅：<http://www.arij.org/files/admin/2009/The%20environmental%20impact%20of%20Israeli%20military.pdf>.

⁶² 《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海牙第四公约》)，《公约》附件：《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章程》(《海牙章程》)。

因此缺乏关于环境保护的具体规定，但已证明足够灵活，可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加以调整。例如，长期以来，对有些财产权规定的解释一贯是它们适用于石油和水等自然资源，这些资源也是重要的环境资源。破坏、耗尽或不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可能会导致生态系统退化，包括丧失生境和物种。⁶³

14. 其次，报告提到国际法其他相关领域的补充作用，这是工作组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本专题所固有的问题。占领局势包括介于武装冲突与平时时期之间的各种变化形式，从而为审议武装冲突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之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了若干机遇。人们普遍承认，人权法适用于占领局势。不过，人权法如何适用取决于当时的情况，比如占领的性质(平静或动荡)及其持续时间，并在许多方面受作为特别法的占领法限制。人权法与环境之间的多种联系已经得到普遍承认。⁶⁴ 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饮水权、食物权、健康权和生命权，“无法在环境真空中得到保障”，⁶⁵ 而是取决于环境和生态系统保护。除了实质性的环境权利，程序性权利有助于保护环境，在居民的参与权和获得环境风险信息方面最为相关。⁶⁶

15. 环境问题已经渗入大多数国际法领域。国际法院对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发表的咨询意见明确指出，武装冲突法也同样如此。⁶⁷ 委员会就“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专题开展的工作同样也为审议国际环境法如何能补充武装冲突法铺平了道路。⁶⁸ 与人权法大体相同的是，占领局势的具体背景以及占领法的规定可能会限制国际环境义务的实际适用。

16. 本报告借鉴了以往关于这一专题的三份报告，力求确保与迄今已开展的工作协调一致。委员会就此专题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应保持不变：委员会不打算、也不

⁶³ 见 D. Jensen and S. Lonergan (eds.), *Assessing and Restoring Natural Resources in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Abingdon, Routledge, 2013。

⁶⁴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环境署，《人权与环境：里约+20：人权高专办和环境署的联合报告》，2012年；人权理事会，与享有安全、清洁、卫生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独立专家约翰·诺克斯 2013年12月30日的报告(A/HRC/25/53)，及其2015年2月3日的进一步报告(A/HRC/28/61)和2018年1月24日的报告(A/HRC/37/59，作为同一问题的特别报告员提出)。

⁶⁵ K. Hulme, “Using a framework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for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mediation”, in Carsten Stahn, Jens Iverson and Jennifer S. Easterday, e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itions from Conflict to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19–142, p. 124。

⁶⁶ 例如，见《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1992年8月12日(A/CONF/151/26/Rev.1(vol.I))，第5页，原则10。

⁶⁷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26页。

⁶⁸ 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07-130页，第100-101段。

能修改武装冲突法。⁶⁹ 在此基础上，报告将侧重于确定和澄清根据国际法产生的与在占领局势中保护环境有关的指导原则和(或)义务。

17. 本报告第一章涉及根据占领法保护环境。A 节总体介绍了占领概念。B 节涉及作为保护环境的基础的财产权。C 节概述了从保护环境角度出发具有相关意义的其他占领法规则。第二章讨论占领法与人权法的互补关系，特别注重健康权。第三章讨论了占领法与国际环境法的互补关系。第四章载有本报告提出的新的原则草案，第五章涉及本专题今后的工作。

18. 为方便起见，委员会迄今暂时通过的八项原则草案以及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九项原则草案已载于本报告附件。

一. 依据占领法保护环境

A. 占领的概念

19. 武装冲突法认为军事占领局势是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一种特定形式。在这方面值得回顾的是，国际性武装冲突结束的标志是军事行动全面结束，⁷⁰ 或如果存在占领，则是占领终止。⁷¹ 占领局势受武装冲突法特别规则约束。然而实际上，占领在许多方面与武装冲突不同。最显著的是，占领通常不以现行敌对行动为主要特征，甚至可能出现在入侵武装部队没有遭遇武装抵抗的局势中。⁷² 目前没有关于占领持续时间的既定规则，大量情形可构成占领局势。尤其是长时间的占领，可能“近似和平时期”。⁷³ 不过，武装冲突期间外国对部分领土的多次短期统治亦可构成占领。⁷⁴ 占领期间，占领国可能面临武装抵抗，甚至暂时丧失对部

⁶⁹ 特别报告员玛丽·雅各布松女士的初步报告，A/CN.4/674 和 Corr.1，第 62 段。

⁷⁰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第 6 条。根据该条第 3 款，该公约在被占领土内之适用，于军事行动全面结束后一年应即停止；而占领国“在该国于占领地内行使政府职权之限度内”，继续受多条规定的约束。

⁷¹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 3(b)条。对《第一议定书》缔约方来讲，这一条款实际上取代了“一年规则”(UK Ministry of Defence, *The Manual of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77, para.11.8); 另见 R. Kolb and S. Vité, *Le droit de l'occupation militaire. Perspectives historiques et enjeux juridiques actuels*, Brusells, Bruylant, 2009, p.166。

⁷²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第 2 条，第 2 款。

⁷³ A. Roberts, “Prolonged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Israeli-occupied territories since 196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4 (1990), pp. 44-103, p. 47。该条提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时间持续五年以上的若干占领案例。

⁷⁴ 据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偿委员会称，“一方面，很显然，某一地区上战斗仍在持续且攻击部队尚未确立控制时，该地区一般不能视为已被占领……。另一方面，在被敌国武装部队控制哪怕只有几天的地区即使没有发生战斗，本委员会认为适用于被占领土的法律规则应当适用。”(《部分裁决：中部前线-厄立特里亚第 2、4、6、7、8 和 22 号索偿，2004 年 4 月 28 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十六卷，第 115-153 页，见第 136 页，第 57 段。

分被占领土的控制，但这并不影响对这一局势构成占领局势的定性。⁷⁵ 然而一般而言，武装敌对行动阶段和占领阶段仍有别于彼此并受不同规则约束。在这方面，可以说占领构成了战争与和平的中间阶段。⁷⁶

20. 对占领概念的既定理解以 1907 年《海牙章程》第 42 条为基础，根据这条规定，“领土如实际上被置于敌军当局的权力之下，即被视为被占领的领土。占领只适用于该当局建立并行使其权力的地域”。该定义涵盖了管控某领土的权力未经领土国同意从领土国移交至占领国的情形，但也延伸至处于外国统治下的地位不明的领土。⁷⁷ 国际法院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确认了第 42 条所载定义，称之为确定是否存在武装冲突法规定的占领局势的唯一标准。⁷⁸ 1907 年的定义以交战占领⁷⁹ 这一传统概念为基础，但现在这一定义涵盖了“一国或若干国武装部队在其公认的国际边界以外有人居住的领土上临时行使权力的广泛情形”。⁸⁰

21. 第 42 条所述局势的主要特点是有效控制，这被描述为占领的必要条件。⁸¹ 在这方面，占领国武装部队未经当地政府有效同意便实际进入被占领土并不足够。根据对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的判决，须“[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乌干达武装部队不仅驻扎在特定地点，还以其自身权力取代刚果政府权力”。⁸² 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是个事实性的概念；占领“并非向占领者移交主权，而仅是移交行使一些主权权利的权力”。⁸³ 在讨论什么局势构成占领局势时，“有效控制”的含义取决于当时

⁷⁵ 红十字委员会，2016 年对《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第一公约》）第 2 条的评注，第 302 段。可查阅：www.icrc.org。类似观点见 *The Manual of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上文脚注 71)，p.277, para.11.7.1。

⁷⁶ Kolb and Vit , (见上文脚注 71)，p.114: “le r gime de l'occupation reste principalement un droit de transition de la guerre vers la paix(占领制度主要指从战争过渡到和平的法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把占领描述为“入侵后和就停止敌对行动达成一致前的一段过渡期”，见《检察官诉姆拉登·纳莱迪里奇(别名“图塔”)和温科·马丁诺维奇(别名“斯特拉”)，案件编号：IT-98-34-T，2003 年 3 月 31 日的判决》，审判分庭，第 214 段。

⁷⁷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36 页，见第 174-175 页，第 95 段。

⁷⁸ 同上，第 78 段；《检察官诉纳莱迪里奇和马丁诺维奇》(见上文脚注 76)，第 215 段。另见红十字委员会，《2016 年……第 2 条评注》(见上文脚注 75)，第 298 段。

⁷⁹ 见 E. Benvenisti, “Occupation, belligerent”, para. 1,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可查阅：www.mpepil.com。

⁸⁰ A. Roberts, “Occupation, military, termination of”, para. 3, 同上。另见 A. Roberts, “What is a military occupation”,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55, No.1 (1985), pp. 249-305。

⁸¹ Y. Dinste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Belligerent Occup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3。

⁸²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判决，200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68 页，见第 230 页，第 173 段。另见 *The Manual of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上文脚注 71)，第 275 页，第 11.3 段。

⁸³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Law of War Manual*, June 2015, updated December 2016 (*United States Law of War Manual*), sect. 11.4, pp. 752-754。另见 K. D rmann and H.-P. Gasser, “Protection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in D. Fleck (ed.), *Th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31-320, at p. 274, para. 529。

的情况。⁸⁴ 只要占领国确立了自身权力并保持行使这一权力的能力，占领国便无须时刻全面控制被占国整个领土或部分领土。⁸⁵ 一旦占领国在某陆地领土确立了权力，占领国权力便被视为也延伸至毗邻海域以及上方大气空间。⁸⁶

22. 虽然普遍认为，占领的结束必须以占领开始所须的相同条件为基础来确定——存在有能力行使有效控制的敌对力量、领土元首丧失能力⁸⁷——但占领的结束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⁸⁸ 例如，2005 年以色列撤离加沙一事便引发了不同的法律评价。有论者谈到这只是占领的延续，⁸⁹ 也有论者认为是过渡到其他法律制度，⁹⁰ 还有论者提出继续适用占领法某些方面。根据所谓的“功能性方法”，占领法可依据占领国行使控制的性质和程度分阶段适用。⁹¹ 红十字委员会也认为，在“某些特殊和例外的情况下”，当外国部队撤出被占领土，但仍保留权力的关键要素或其他通常由占领国担负的重要政府职能时，“占领法可能在上述权限的地域和职责范围内继续适用”。⁹²

23. 红十字委员会《2016 年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 2 条评注》提出，建立国际人道主义法意义上的占领状态必须同时满足 3 个条件：

⁸⁴ 例如地形、人口密度或抵抗程度；见 Dinstein(上文脚注 82), p.43-4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Law of War Manua* (见上文脚注), sect. 11.2.2.1, p. 746。另见《检察官诉纳莱迪里奇和马丁诺维奇》(见上文脚注 76), 第 218 段；审判分庭认为须逐案确定在有关时间和有关地点是否确立了所需的控制程度。

⁸⁵ 红十字委员会，《2016 年……第 2 条评注》(见上文脚注 75), 第 302 段。另见 *The Manual of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上文脚注 71), p.275, para.11.3。

⁸⁶ *Manual of the Laws of Naval War*, Oxford, 9 August 1913, Section VI, art. 88, 可查阅: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INTRO/265?OpenDocument>; Dinstein(上文脚注 81), p.47; E. Benvenisti,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Occupation*,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55, 提及若干占领者的做法; M. Sassòli, “The Concept and Beginning of Occupation”, in A. Clapham, P. Gaeta, and M. Sassòli (eds.), *The 1949 Geneva Conventions: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389-1419, at p. 1396。

⁸⁷ Kolb and Vité(见上文脚注 71), p.15; 红十字委员会，《2016 年……第 2 条评注》(见上文脚注 75), 第 306 段。

⁸⁸ Roberts, “Occupation, military, termination of” (见上文脚注 80); 红十字委员会，《2016 年……第 2 条评注》(见上文脚注 75), 第 305 段。

⁸⁹ Dinstein 认为“以色列坚持有(自行判断)采取军事行动重夺加沙地带任何部分的自由”便是“占领非终止的最明显特点”(见 Dinstein(上文脚注 81), p.279, para.670)。

⁹⁰ Kolb 和 Vité认为此类局势可由占领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制度涵盖，特别是人权法(见上文脚注 71, p.182)。

⁹¹ A. Gross,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Rethinking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Occup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另见 Gross, “Rethinking Occupation: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Opinio Juris* (2012 年 4 月 23 日), 可查阅: www.opiniojuris.org/2012/04/23/symposium-on-the-functional-approach; T. Ferraro, “Determining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an occup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4, No. 885 (Spring 2012), pp. 139-163。

⁹² 红十字委员会，《2016 年……第 2 条评注》(见上文脚注 75), 第 307 段。

- 一国武装部队入侵一外国领土时未经其合法有效政府的同意而实际部署于该领土；
- 由于外国军队未经同意的部署，入侵期间该领土合法有效的政府已经或可能在实质上或完全无法行使其权力；
- 外国军队有能力取代当地政府对有关领土(或其一部分)行使权力。⁹³

24. 本文转载该定义供参考。委员会尚未决定是否有必要在原则草案中讨论术语使用问题。前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中载有“武装冲突”和“环境”的暂定定义。⁹⁴这两个定义均以委员会早前的工作为基础：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所载的“武装冲突”定义，⁹⁵以及关于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对“环境”的定义。⁹⁶委员会早前工作中找不到涉及“占领”定义的类似先例。还应当指出，若纳入“武装冲突”的定义，出发点是为了涵盖各种占领局势。⁹⁷

25. 被占领土的地位往往有争议，包括占领国依靠当地代理人、过渡政府或叛乱团体对被占领土行使控制等情形。⁹⁸然而，人们普遍承认，只要当地代理人代表一国行事，对被占领土行使有效控制，则占领法适用于这类情况。⁹⁹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已承认可能存在这种“间接占领”，该法庭提到“外国仅通过当地事实上的机关或代理人的行为‘占领’某领土或在该领土内活动”的一些情形。¹⁰⁰国际法院在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中似乎也已认为，若刚果反叛运动处于乌干达

⁹³ 同上，第 304 段。

⁹⁴ 特别报告员玛丽·雅各布松女士的初步报告，A/CN.4/674 和 Corr.1，第 78 段(“武装冲突”)和第 86 段(“环境”)。

⁹⁵ 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及评注，《201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2(b) 条，第 110-111 页。

⁹⁶ 关于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及评注，《200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64 页，原则 2(b)。

⁹⁷ 委员会认为，“应该包括牵涉到当事方之间不发生武装行动的武装冲突状态的局势。因此，该定义包括没有遭遇武装抵抗的领土占领情形”，《201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10 页，条款草案 2 评注第(6)段。

⁹⁸ Roberts, “Prolonged military occupation” (见上文脚注 73), p.95; Dörmann and Gasser(见上文脚注 83), p.272。

⁹⁹ Benvenisti,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Occupation*(见上文脚注 86), p. 61-62。同样，红十字委员会，专家会议：占领和以其他形式管理外国领土，2012 年，第 10 和 23 页(同意了“间接有效控制”理论)。另见 *The Manual on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上文脚注 71), p.276, para.11.3.1(“很可能可以适用”)；Kolb and Vité(见上文脚注 71), p.181；红十字委员会，《2016 年……第 2 条评注》(见上文脚注 75)，第 328-332 段。

¹⁰⁰ 见《检察官诉杜斯科·塔迪奇(别名“Dule”，案件号：IT-94-1-A，1997 年 5 月 7 日的意见和判决》，审判分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第 584 段。另见《检察官诉蒂霍米尔·布拉斯基奇，案件号：IT-95-14-T，2000 年 3 月 3 日的判决》，审判分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第 149-150 段。

“控制之下”，则乌干达便是这些非国家武装团体控制和管理的地区的占领国。¹⁰¹ 此外，欧洲人权法院已确认，《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缔约国在其国家领土以外有效控制的地区维护《公约》规定的权利与自由这项义务“源于控制这一事实，无论这种控制是直接进行，通过其武装部队进行，还是通过一个附属的地方行政当局进行”。¹⁰²

26. 无论占领国是否援用占领法制度，占领法均适用于满足有效控制外国领土的实际要求的所有局势。¹⁰³ 这些情况很少见。¹⁰⁴ 因此实际适用占领法的国家实践仅限于若干案例，其中最著名的是 1967 年以来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 2003 至 2004 年的伊拉克。尽管如此，国际和区域法院仍积累了一部分判例法，包括国际法院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¹⁰⁵ 及其对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的判决、欧洲人权法院关于北塞浦路斯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等案¹⁰⁶ 的若干判决、埃塞尔比亚-厄立特里亚索偿委员会的裁决¹⁰⁷ 以及一些二

¹⁰¹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上文脚注 82)，第 231 页，第 177 段。另见科艾曼斯法官的个别意见，同上，第 317 页，第 41 段。

¹⁰² *Loizidou v. Turkey, Application No. 15318/89, Judgment (Merits) of 18 December 1996, Grand Chamber,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VI, para. 52*: “若军事行动导致一缔约方对其领土以外的一个地区行使有效控制，则不论军事行动是合法还是非法，亦可引发该缔约方的责任。”在这类地区维护《公约》规定的权利与自由的义务“源于控制这一事实，无论这种控制是直接进行，通过其武装部队进行，还是通过一个附属的地方行政当局进行”。

¹⁰³ *The Hostages Trial: Trial of Wilhelm List and Others*: “入侵是否已发展成占领是个事实问题” (Case No. 47, United States Military Tribunal at Nuremberg, Law Reports of Trial of War Criminals, vol. VIII, London,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1949, p. 55。另见《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上文脚注 82)，第 230 页，第 173 段；《检察官诉纳莱迪里奇和马丁诺维奇》(见上文脚注 76)，第 211 段；红十字委员会，《2016 年……第 2 条评注》(见上文脚注 75)，第 300 段。

¹⁰⁴ Benvenisti 在分析了 1970 年代以来 14 起不同的占领案例后得出结论认为，一般而言，占领者没有援引占领法作为其权力来源(Benvenisti,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Occupation*(见上文脚注 86), pp. 167-202)。另一位作者认为 1945 年至 2006 年间有 19 起占领案例符合《海牙章程》规定的标准，见 G.H. Fox, “Exit and military occupations”, in R. Caplan (ed.), *Exit Strategies and State Build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97-223。

¹⁰⁵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见上文脚注 77)。

¹⁰⁶ 例如，见 *Loizidou v. Turkey, Application No. 15318/89,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of 23 March 1995,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Series A: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vol. 310, and Judgment (Merits) of 18 December 1996* (上文脚注 102); *Cyprus v. Turkey, Application No. 25781/94, Judgment of 10 May 2001, Grand Chamber,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2001-IV, p. 1*; and *Chiragov and Others v. Armenia, Application No. 13266/05, Judgment (Merits) of 16 June 2015, Grand Chamber,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2015*。

¹⁰⁷ 例如，见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偿委员会，《部分裁决：中部前线——厄立特里亚第 2、4、6、7、8 和 22 号索偿》(上文脚注 74)。

战后的案件。¹⁰⁸ 但仍有一些其他局势被安全理事会或大会定性为占领。¹⁰⁹ 下文特别提到此类局势，因为它们可以为本专题提供参考。此外，偶尔会提到联合国各机构的相关做法。

B. 通过财产权保护环境

27. 占领法是武装冲突法的特定子集，一般认为武装冲突法包括中立法、占领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¹¹⁰ 涉及占领的特别规则载于 1907 年《海牙章程》以及《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第三部第三篇，题为“占领地”。此外，根据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 2 条，所有四项公约全部适用于占领局势。¹¹¹ 有人认为《海牙章程》反映了习惯国际法，¹¹² 而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则已得到普遍批准。¹¹³ 对缔约国而言，《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适用于占领局势。¹¹⁴

28. 以下讨论仅限于有关占领局势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并不全面讨论占领法其他方面。需要强调的和占领有关的具体规定首先涉及财产权；其次涉及某些受保护物体；再次则涉及占领国在被占领土恢复和维持公共秩序与安全的一般义务。虽然这些规定背后的依据是确保财产权、开采权和经济利益，或确保民众的生存和福祉，

¹⁰⁸ 例如，见“*The Krupp Case*”，*Case No. 10, Judgment of 31 July 1948*, United States Military Tribunal at Nuremberg, *Law Reports of Trial of War Criminals*, vol. IX, London,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1950, p. 1340; *Prosecutor v. Hermann Wilhelm Göring et al.*, *Judgment of 1 October 1946*,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vol. 1, Nuremberg, 1947; and *Prosecutor v. E. W. Bohle et al.*, *Judgment of 14 April 1949*,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 10*, vol. XIV,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

¹⁰⁹ 例如，见大会 1979 年 11 月 21 日第 34/37 号和 1980 年 11 月 11 日第 35/19 号决议(关于西撒哈拉问题)；大会 1982 年 10 月 28 日第 37/6 号和 1989 年 11 月 16 日第 44/22 号决议(关于柬埔寨局势)；安全理事会 1969 年 8 月 12 日第 269(1969)号和 1970 年 1 月 30 日第 276(1970)号决议(关于纳米比亚局势)；安全理事会 1993 年 4 月 30 日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第 822(1993)号决议；安全理事会 1993 年 7 月 29 日关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第 853(1993)号决议；安全理事会 1991 年 4 月 3 日关于伊拉克/科威特的第 687(1991)号决议。

¹¹⁰ 然而“武装冲突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这两个术语常常混用。

¹¹¹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第 2 条第(2)款：“凡在一缔约国的领土一部或全部被占领之场合，即使此项占领未遇武装抵抗，亦适用本公约。”

¹¹²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见上文脚注 77)，第 172 页，第 89 段；《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见上文脚注 82)，第 243-244 页，第 217 段。另见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Trials of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vol. XXII, Nuremberg, 1948, p. 497。

¹¹³ 见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search.nsf/content.xsp>。

¹¹⁴ 第 1 条第 3 款规定，议定书“应适用于[日内瓦]各公约共同第二条所指的各场合”。

但它们也视情况间接保护了环境。相关演变已出现在人权法领域。美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显示，财产权已与环境保护挂钩，尤其是涉及土著人民的土地时。¹¹⁵

29. 如今，通常认为占领法中关于财产权的一些具体条款适用于被视为“被占领土上的财产”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海牙章程》第 55 条，该条为占领国管理被占领土的自然资源提供了主要依据。第 55 条列明了占领国对被占领土上公共不动产作出限制的所谓用益权规则：“占领国对其占领地内属于敌国的公共建筑、不动产、森林和农庄，只是被视为管理者和收益的享用者。占领国必须维护这些产业并按照享用收益的规章加以管理。”

30. 一般认为，第 55 条提及的“公共建筑、不动产、森林和农庄”并非详尽无遗，而是适用于所有不用于军事目的的公共不动产。¹¹⁶ 罗马法的用益权概念字面上是指享有财产的果实，被界定为使用属于他人的资产并从这些资产中获得收益而不改变其实质内容的权利。¹¹⁷ 尽管“果实”这一概念可被视作具有限制性，但这一权利历来被认为适用于包括不可再生资源在内各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因此，用益权规则被视为允许占领国“租赁或利用公共土地或建筑物，出售作物，砍伐和出售木材，开采矿藏”，¹¹⁸ 并将当地公共财产的“果实”用于其他用途。

31. 此外还确认，占领国在保护被占领土的自然资源方面负有某些义务。Oppenheim 认为，占领国“不得以浪费或疏忽方式行使其权利，这会降低存量和植物的价值”，并且“除非战争需要所迫，不得砍伐整个森林”。¹¹⁹ Von Glahn 强调，占领国“不得在超过正常使用范围的情况下利用不动产，而且不能砍伐比占领前更多的木材”。¹²⁰ Stone 指出，用益权规则禁止“以浪费或疏忽方式破坏资本价值，无论是过度砍伐还是采矿或其他滥用性开发，这违背良好的资源管

¹¹⁵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Rights over Their Ancestral Lands and Natural Resources, Norms and Jurisprudence of the Inter-American Human Rights System, OEA/Ser.L/V/II., Doc.56/09, 30 December 2009, paras. 194 and 215.

¹¹⁶ 例如，见 The Manual on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上文脚注 71)，第 303 页，第 11.86 段。

¹¹⁷ 见 T. MacKenzie, Studies in Roman Law with Comparative Views of the Laws of France, England, and Scotland, 2nd ed., Edinburgh and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80，第二部分(of the law relating to real rights)，第六章(“Of usufruct, use, and habitation”)，pp. 181-182。关于对大陆法域用益权规则的评价，见 E. R. Cummings, "Oil resources in occupied Arab territories under the law of belligerent occup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Economics, vol.9, No.3 (December 1974), pp. 533-594。

¹¹⁸ E. H. Feilchenfel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of Belligerent Occupat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42, p. 55。另见 L.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vol. II, War and Neutrality, 2nd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2, p. 175; G. von Glahn, The Occupation of Enemy Territory: A Commentary on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Belligerent Occupation,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7, p. 177。类似观点见 The Manual of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上文脚注 71)，第 303 页。

¹¹⁹ Oppenheim(见上文脚注)，第 175 页。

¹²⁰ Von Glahn(见上文脚注 118)，第 177 页。

理规则”。¹²¹ 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活动的传统文献一般认为，占领国应仅在军事需要的范围内使用自然资源。¹²²

32. 1970 年代，开始就占领国在开发不可再生资源特别是石油方面合法权利的确切范围提出问题。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允许占领国将有关资源的产量增加至超过占领前水平，或开发新矿或新井。赞成者提出的理由包括财产价值的提高、¹²³ 使用新技术的好处¹²⁴ 或当地居民的需求。¹²⁵ 然而，总的来说，这种活动被认为超出了占领国作为暂时管理者的权限。¹²⁶ 虽然增加有限资源开发的问题并非没有环境影响，¹²⁷ 但辩论的主要重点是资源分配。然而，最近在为开发和保护自然资源制定一般法律框架的同时，环境考虑作为占领国“维护这些产业”责任的一个要素受到关注。有观点认为，为了遵守第 55 条，占领国必须“控制该地区的自然资源，保护其免遭过度使用和污染，并在各个国内用户之间公平合理地

¹²¹ J. Stone, *Legal Control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 Treatise on the Dynamics of Disputes and War-Law*, London, Stevens and Sons Limited, 1954, p. 714.

¹²² 例如，见 Feilchenfeld(上文脚注 118)，第 55-56 页；M. S. McDougal and F. P. Feliciano, *Law and Minimum World Public Order: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erc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823.

¹²³ A. Gerson, “Off-Shore oil exploration by a belligerent occupant: the Gulf of Suez disput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1, No. 4 (October 1977), pp. 725-733.

¹²⁴ Dinstein(见上文脚注 81)，第 214 页；and R. D. Langenkamp and R. J. Zedalis, “What happens to the Iraqi oil?: thoughts on some significant, unexamined international legal questions regarding occupation of oil field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4, No. 3 (2003), pp. 417-435.

¹²⁵ Dinstein(见上文脚注 81)，第 216 页，第 510 段。

¹²⁶ M. Leigh,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 on law on Israel's right to develop oil fields in Sinai and the Gulf of Suez”,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 16, No. 3 (1977), p. 733-753; B. M. Clagett and O. T. Johnson, Jr., “May Israel as a belligerent occupant lawfully exploit previously unexploited oil resources of the Gulf of Suez?”,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2, No. 3 (1978), pp. 558-585; Cummings(上文脚注 118); A. Cassese, “Powers and duties of an occupant in relation to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E. Playfair (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ies: Two Decades of Israeli Occupation of the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19-442; and I. Scobbie, “Natural resources and belligerent occupation: 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nd human rights law” in S. Akram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A Rights-based Approach to Middle East Peace*, Abingdon, Routledge, 2011.

¹²⁷ 关于采掘业对环境的影响，见与危险物质和废物环境友好型管理及处置有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特别报告员 Calin Georgescu 的报告(A/HRC/21/48)。另见 P. Lujala and S. Aas Rustad (eds.), *High-Valu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Abingdon, Earthscan, 2012.

分配这些资源”，¹²⁸ 或占领国的责任包括“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¹²⁹ 第三章将更详细地审议这些观点。

33. 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这一原则也影响到对第 55 条的解释。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¹³⁰ 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¹³¹ 所载的这一原则，“所有人民得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而不损害根据基于互利原则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法而产生的任何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大会的一些决议也阐明了这一原则。¹³² 国际法院已确认其习惯法性质。¹³³ 关于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这一概念的含义，它与一般自然资源国际法经历了类似的发展，环境问题和可持续性在对该法的解释中日益赢得关注。¹³⁴

34. 关于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是否适用于武装冲突和占领局势，提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国际法院在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中发表声明表示，它不认为该原则适用于“军事干预另一国的一国军队成员抢掠、抢劫和开发某些自然资源的具体情况”。¹³⁵ 鉴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被占领的伊图里地区的抢掠并没有被视为基于政府政策，不清楚这一声明应解释为是指一般的武装冲突和占领局势，¹³⁶

¹²⁸ Benvenisti,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Occupation*(见上文脚注 86), 第 81 页, 另见 E. Benvenisti, “Water conflicts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Iraq”,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7, No. 4 (October 2003), pp. 860-872, at p. 870。类似观点见 D. Dam-de Jong, *International Law and Governance of National Resources i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itu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28-229。

¹²⁹ M. Bothe, “The administra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y”, in A. Clapham, P. Gaeta and M. Sassòli (eds.) *The 1949 Geneva Conventions: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455-1484, at p. 1467。另见 B. Saul, “The Status of Western Sahara as occupied territory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Global Change, Peace and Security*, vol. 27 No.3 (2015), pp. 301-322, at p. 319。

¹³⁰ 第 1 条第 2 款。

¹³¹ 第 1 条第(2)款。

¹³² 见大会 1962 年 12 月 14 日第 1803(XVII)号、1974 年 5 月 1 日第 3201(S.VI)号(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 1974 年 12 月 12 日第 3281(XXIX)号决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¹³³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见上文脚注 82), 第 251-252 页, 第 244 段。

¹³⁴ 见 N. Schrijver, *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s: Balancing Rights and Du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20-140 and 368-395; and V. Barral, “National 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 Morgera and K. Kulovesi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Natural Resourc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6, pp. 3-25, at p. 7。

¹³⁵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见上文脚注 82), 第 251-252 页, 第 244 段。另见科罗马法官的声明, 第 11 段, 认为“这些权利和利益始终有效, 包括在武装冲突和占领期间”。

¹³⁶ 正如 R. Pereira 和 O. Gough 的观点, “Permanent 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21st century: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and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4, No. 2 (2013), pp. 451-495, at p. 463。

还是指该案的具体情况。¹³⁷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都对武装冲突和占领局势援引了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原则。¹³⁸ 若永久主权原则不适用于占领局势，将很难与占领作为不应影响领土国主权的暂时管理的法律性质相调和。此外，双方国家和人民都是这一原则的受益者。

35. 同样，在开发被占领土内自然资源方面，特别是在领土不属于任何已经建立的国家的情况下，可援引自决原则。¹³⁹ 国际法院在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中指出，修建隔离墙以及占领国采取的其他措施“严重妨碍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¹⁴⁰ 国际法院在对南非继续驻留纳米比亚¹⁴¹ 和西撒哈拉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¹⁴² 中也提及自决权，在东帝汶案中提及自决权，法院在该案中确认了这项原则的普遍适用性。¹⁴³ 法院没有就东帝汶案作出判决，该案的案情主要涉及一项关于开发帝汶沟周围自然资源的条约的合法性，该条约据称侵犯了东帝汶的自决权和对其实质和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¹⁴⁴

36. 在过去几十年中，关于占领局势中利用和保护水资源的问题一再提出。这并不奇怪，因为报告最多的两个占领局势，即 1967 年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 2003 年至 2004 年的伊拉克，都位于严重缺水的地区。¹⁴⁵ 虽然法律意见的主旨是公平分配和获取用水，¹⁴⁶ 但也提出了与可持续性和水资源保护有关的问题。¹⁴⁷ 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私人的，由被占领国的国家立法决定。

¹³⁷ N. Schrijver, “Natural resources, permanent sovereignty over”, 第 18 段,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可查阅: www.mpepil.com。

¹³⁸ 例如见安全理事会 2000 年 2 月 24 日第 1291(2000)号决议(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 序言, 第 4 段; 大会 1974 年 12 月 17 日第 3336(XXIX)号决议(对阿拉伯被占领土内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权), 第 3 段; 大会 2016 年 12 月 21 日第 71/247 号决议(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¹³⁹ 例如非自治领土, 见《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

¹⁴⁰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见上文脚注 77), 第 122 段。

¹⁴¹ 《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 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 咨询意见, 197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16 页, 见第 31-32 页, 第 52-53 段。

¹⁴² 《西撒哈拉, 咨询意见, 197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12 页, 见第 32-33 页, 第 56-59 段。

¹⁴³ 《东帝汶(葡萄牙诉澳大利亚), 判决, 199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90 页, 见第 102 页, 第 29 段。

¹⁴⁴ 同上, 第 104 页, 第 33 段。

¹⁴⁵ H. Tropp and A. Jägerskog, *Water Scarcity Challeng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Water Institute, 2006。

¹⁴⁶ G. Abouali, “Natural resources under occupation: the Status of Palestinian water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Pac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10, No. 2 (Fall 1998), pp. 411-574; Scobbie(见上文脚注 126); and A. Abu-Eid, “Water as a human right: the Palestinian Occupied Territories as 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vol. 23, No. 2 (June 2007), pp. 285-301。

¹⁴⁷ 环境署, 《根据文件编写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环境研究报告》(见上文脚注 58), 第 10-11 页; and Benvenisti, “Water conflicts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Iraq” (见上文脚注 128), 第 868 页。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水资源被列为公共不动产，《海牙章程》第 55 条就具有相关性。至于水作为动产或不动产的地位，已有的观点似乎认为河流、湖泊、湿地和含水层中的淡水资源是不动产。¹⁴⁸ 根据第 55 条，占领国作为用益权人，需要防止过度开发资产，并保持其长期价值。¹⁴⁹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可以援引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强调占领国有责任保护水资源，使其质量或数量不受严重损害。

37. 一般而言，只有在支付占领费用所需的范围内，才允许扣押和开发财产，并且“这些不应超过该国经济可以合理预期的承受能力”。¹⁵⁰ 对开发被占领土财富和自然资源的另一个限制源于占领的性质，即暂时、非主权的领土管理，不允许占领国将被占领国家或领土的资源用于其国内目的。¹⁵¹ 正如国际法学会总结的那样，“占领国只能在当前领土管理和满足人们基本需要所需的范围内处置被占领土的资源”。¹⁵² 同样，联合王国和美国在 2003 年 5 月给安全理事会的信件中强调，参加联盟的国家将“力求确保伊拉克石油受到保护并且用于伊拉克人民”。¹⁵³ 也可以参考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法院在该案中提到了人道主义法允许开发自然资源用于当地居民这一原则。¹⁵⁴

38. 如前所述，《海牙章程》对财产的保护因有关财产是公共还是私人财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而异。《海牙章程》第 53 条第 1 款涵盖了公共动产，其中规定：“占领军只能占有严格属于国家的现款、基金和有价证券、武器库、运输工具、货栈和供应品以及一般供作战用的一切属于国家的动产。”除上述一般限制外，只要公共动产可以用于军事行动，占领国可以对其自由扣押和处置。但是，关于这一规定是限于易被直接用作军事用途的财产，¹⁵⁵ 还是延伸到仅间接服务于军事目

¹⁴⁸ H. Dichter, “The legal status of Israel’s water policie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5(1994), pp. 565-594, p. 582; and Cassese(见上文脚注 126), 第 426 页。

¹⁴⁹ Dichter(见上文脚注), 第 577 页。另见 the Berlin Rules on Equitable U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s,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eport of the Seventy-First Conference, Berlin, 16-21 August 2004, London, 2004, p. 334, art. 54.

¹⁵⁰ *Prosecutor v. Hermann Wilhelm Göring et al.*(见上文脚注 108), 第 239 页。

¹⁵¹ *Singapore, Court of Appeal, N.V. de Bataafsche Petroleum Maatschappij and Others v. The War Damage Commission*, 13 April 1956, Reports: 1956 Singapore Law Reports, p. 65; reprint in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vol. 23 (1960), pp. 810-849, p. 822 (Singapore Oil Stocks case); and “The Krupp Case” (见上文脚注 108), p. 1340.

¹⁵²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Bruges Declaration on the use of force, September 2, 2003.

¹⁵³ S/2003/538(2003 年 5 月 8 日)。另见安全理事会第 1483(2003)号决议, 第 20 段, 其中安全理事会要求“(石油)销售的所有收入均应存入伊拉克发展基金, 直至妥善组成国际承认的有代表性的伊拉克政府”。

¹⁵⁴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见上文脚注 82), 第 253 页, 第 249 段。

¹⁵⁵ Stone(见上文脚注 121), 第 715 页; 与之类似, Cummings(见上文脚注 118), 第 575-578 页, 提及国家战争罪审判; and Cassese(见上文脚注 126), 第 428 页。另见 J. G. Stewart, *Corporate War Crimes: Prosecuting Pillage of Natural Resources*, Open Society Justice Initiative,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2011, pp. 55-56, 提及该条款的谈判历史, 以支持前一观点。

的财产，例如折算成货币时，¹⁵⁶ 意见不一。虽然第 53 条第 1 款的表述中没有提到自然资源，但一般认为其涵盖了从土壤中开采的原油等。其他可开采资源一旦开采，是否可构成第五十三条第 1 款意义上的动产，取决于如何界定与军事行动的必然联系。可开采资源只要仍处于地下，一般被视作不动产，¹⁵⁷ 但关于地下原油作为动产或不动产的地位，存在一些争议。¹⁵⁸

39. 占领下的私人财产受到更有力的保护，一般不可没收或扣押。¹⁵⁹ 《海牙章程》第 53 条第 2 款特别允许除其他外扣押“各种军火”，该条既适用于公共财产，也适用于私人财产，但普遍承认，财产必须具有易被直接用于军事用途的性质，才能定性为“军火”。¹⁶⁰ 一般规则的其他例外情况包括为军事目的暂时扣押私人不动产和为占领军的需要征用动产。¹⁶¹ 这两种例外情况中的第一种，即为驻扎部队或军事演习扣押不动产，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¹⁶² 否则，根据占领法对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私人财产的保护可以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防止可能造成严重环境损害的过度或不加选择的开发。¹⁶³

40. 保护自然资源和某些其他环境组成部分的另一项限制是，普遍禁止破坏或扣押被占领土内的公共或私人动产或不动产，除非这种破坏或扣押是军事行动所绝对必要的。¹⁶⁴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第 53 和 147 条将“无军事上之必要而以非法与暴乱之方式对财产之大规模的破坏与征收”

¹⁵⁶ Oppenheim(见上文脚注 118)，第 176 页，第 137 段；von Glahn(见上文脚注 118)，第 181 页；McDougal 和 Feliciano(见上文脚注 122)，第 813 页；and Dinstein(见上文脚注 81)，第 219 页，第 517 段。

¹⁵⁷ 《海鸟粪案(智利、法国)，1901 年 7 月 5 日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五卷，第 77-387 页，见第 367 页。

¹⁵⁸ 《新加坡石油储藏案》(见上文脚注 151，第 823-824 页)，支持地下原油属于不动产的立场。与之类似：Cummins(见上文脚注 118)，第 558-559 页；Cassese(见上文脚注 126)，第 426 页；Y. Arai-Takahashi, *The Law of Occupa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Leiden, Brill, 2009, p. 212; 与之不同：Dinstein(见上文脚注 81)，第 216-217 页，第 512 段；and *The Manual on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见上文脚注 71)，第 11.81.1 段，第 301 页。

¹⁵⁹ 《海牙章程》第 46 条。

¹⁶⁰ 关于谈判历史，见 E. Lauterpacht, “The Hague Regulations and the seizure of munitions-de-guerr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2(1955), pp.218-226。另见《新加坡石油储藏案》(见上文脚注 151)，第 822-823 页；《检察官诉纳莱迪里奇和马丁诺维奇》(见上文脚注 76)，第 616 段；《检察官诉 Martić，案件号：IT-95-11-T，2007 年 6 月 10 日的判决》，第 102 段；Leigh(上文脚注 126)；and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Law of War Manual*(上文脚注 83)，sect. 11.18.6.2, p. 795。

¹⁶¹ 《海牙章程》第 52 条。

¹⁶² 例如，见 Shelton and Cutting(上文脚注 61)，pp.206-213。也可以参考联合国关于外地行动中常见环境问题的文件。例如，见外勤支助部《环境战略》(2017 年 4 月)和《联合国外地特派团环境政策》(2010 年 6 月)，Ref. 2009.6。

¹⁶³ 关于这种损害的例子，见环境署，《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后环境评估，给政策制定者的综合报告》(环境署 2012 年)。

¹⁶⁴ 《海牙章程》第 23(g)条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第 53 条。

定义为严重破坏公约行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这种行为定义为“抢劫”战争罪。¹⁶⁵

41. 涉及有关抢劫的规则适用的国家惯例和判例有很多。虽然有关抢劫(抢掠或掠夺)的大多数案件涉及占用私人动产、人工制品或毁坏房屋,但有一定数量涉及占领期间抢劫的判例法,专门处理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些案件。¹⁶⁶ 在较近时期,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尤其是对油井的袭击造成大范围环境破坏,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对此进行了记录、评估并做出裁定。¹⁶⁷ 此外,国际法院在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中认定,乌干达不仅对其武装部队成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实施的抢掠、抢占和盗采自然资源行为负有国际责任,而且对以下方面负有国际责任:“违反有关警惕这些行为以及……在被占领土抢掠、抢占和盗采自然资源的所有行为的义务”。¹⁶⁸ 该责任尤其延及于“包括反叛团体在内的在被占领土上为自身利益行事的其他行为体所实施的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¹⁶⁹

42. 此外,《1949年8月12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规定,基于使对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民用物体,“如粮食、……农业区、农作物、牲畜、饮水装置和饮水供应和灌溉工程,对平民居民或敌方失去供养价值的特定目的”,而进行的毁坏、移动或使其失去效用,都是禁止的。¹⁷⁰ 该条款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平民,防止可使平民挨饿或使其迁移的政策。但其中所列举的受保护物体依然具有说明性,并且根据红十字委员会《评注》,应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加以解释,“以便满足所有地理区域民众无限多样的需求”。¹⁷¹ 因此,可将该条款解释为,保护民众赖以生存的总体环境,

¹⁶⁵ 第8条,第(2)(a)(iv)和(b)(xiii)款。

¹⁶⁶ “The Krupp Case”(见上文脚注108),第1337-1372页;U.S.A. v. von Weizsäcker et al. (Ministries case),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ürnberg Military Tribunals, vol. XIV, p. 741。

¹⁶⁷ S/RES/687(1991); C. R. Payne, “Legal li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the United Nations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and the 1990–1991 Gulf War”, in C. Bruch, C. Muffett and S. S. Nichols (eds.), *Governanc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Abingdon, Routledge, 2016, pp. 719-760. 另见 A. Roberts,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the experience of the 1991 Gulf War”, in R. J. Grunawalt, J. E. King and R. S. McClain (eds.),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s*,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vol. 69, Newport RI, Naval War College, 1996, 第222-277页。

¹⁶⁸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见上文脚注82),第253页,第250段。

¹⁶⁹ 同上,第231页,第179段。关于在印度尼西亚占领期间过度采伐森林造成的土壤和水资源损失问题,另见《东帝汶接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最后报告》(2006年1月),第7.9编,经济及社会权利,第48-49段,可查阅:www.chegareport.net。

¹⁷⁰ 第54条第2款案文如下:“不论是什么动机,也不论是为了使平民饥饿、使其迁移、还是为了任何其他动机,基于使对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如粮食、生产粮食的农业区、农作物、牲畜、饮水装置和饮水供应和灌溉工程,对平民居民失去供养价值的特定目的,而进行的攻击、毁坏、移动或使其失去效用,都是禁止的。”

¹⁷¹ 红十字委员会《第一附加议定书评注》,第54条第(2)款,第2102-2013段,可查阅:www.icrc.org。

其中包括水、土壤和空气质量以及健康生态系统。¹⁷² 例如，占领期间导致水资源严重退化的非军事行动可被认为属于“移动”饮水装置和饮水供应或“使其失去效用”的行为。¹⁷³

C. 通过其他占领法规则保护环境

43. 占领国的管辖权也因其有义务在被占领土恢复并维持公共秩序和公民生活而受到限制。《海牙章程》第 43 条规定，“合法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既已落入占领者手中，占领者应尽力采取一切措施，在可能范围内恢复和确保公共秩序和安全并除非万不得已，应尊重当地现行的法律”。第 43 条的法文作准文本所用表述是“公共秩序和公共生活”，因此，该条款被解释为不仅指人身安全，而且还指“构成日常生活内容的社会功能和一般事务，换言之，是指被占领地区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生活”。¹⁷⁴ 此外，这一解释得到准备工作材料的进一步支持。¹⁷⁵ 关于“除非万不得已”这一表述的含义，《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第 64 条补充做出某些具体说明。该条指出，在对以下方面必要时，可修改当地法律：(a) 使占领国得以履行在公约下所负之义务，(b) 维持该地有秩序之统治；(c) 保证占领军或行政机关之安全。¹⁷⁶

44. 这些规定体现了所谓的“自然保护主义原则”，强调需要保持原状，这是占领法的核心。这些规定还体现出占领法既具有非强制性，又具有禁止性。¹⁷⁷ 尽管第 43 条有“除非万不得已”的严格措辞，而且第 64 条提及了“必要之”需求，但相关条款却被解释为使占领国有权在对维护公共秩序和公民生活必要之时制定法律，并且有权修改违反既定人权标准的法律。¹⁷⁸ 皮克泰认为占领国的立法

¹⁷² 联合国环境大会，关于环境与健康的决议，[UNEP/EA.3/Res.4](#)，其中第 5 段提及空气、海洋、水和土壤污染、接触化学品、废物管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影响健康的环境挑战。

¹⁷³ 《水资源平等使用及可持续发展柏林规则》(见上文脚注 149)，第 54 条，第 2 段。另见 *A Matter of Survival: Report of the Global High-Level Panel on Water and Peace*, 2017, 第 22 页，其中澄清了“水设施”的概念，即“实践中往往指对防止平民挨饿至关重要的较大型设施”。

¹⁷⁴ McDougal and Feliciano(见上文脚注 122)，第 746 页。另见 Dinstein(见上文脚注 81)，第 89 页，第 203 段。

¹⁷⁵ 在 1874 年布鲁塞尔会议期间，“公共生活”一词被解释为“构成日常生活内容的社会功能和一般事务”。比利时代表的这种解释得到相关委员会的认可。见比利时外交部，*Actes de la Conférence de Bruxelles de 1874*，第 110 页，可查阅：<https://babel.hathitrust.org/>。

¹⁷⁶ 提及占领地之刑事法规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第 64 条。但是，对该条做出了适用于所有当地法律的解释。见 M. Sassòli, “Legis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and civil life by occupying Power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6, No. 4 (2005), 第 661-694 页，见第 669 页；Dinstein(见上文脚注 81)，第 111 页；Benvenisti,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Occupation* (见上文脚注 86)，第 101 页；and Kolb and Vité (见上文脚注 71)，第 192-194 页。

¹⁷⁷ Roberts, “Prolonged military occupation...”(见上文脚注 73)，第 46 页。

¹⁷⁸ Sassòli, “Legis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and civil life by occupying Powers”(见上文脚注 176)，第 663 页。《武装冲突法手册》指出，武装冲突、维护秩序或人民福祉的迫切要求可能需要新立法(见上文脚注 71，第 284 页，第 11.25 段)。与之类似，见 McDougal and Feliciano(见上文脚注 122)，第 757 页。

权力是“极为宽泛和复杂的”，¹⁷⁹ 同时指出“可以想象，某些修改是必要的，甚至是一种改善”，并解释说，所涉案文旨在“保护人类，而不是保护国家自身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¹⁸⁰

45. 此外，“公民生活”和“有秩序之统治”显然是不断演变的概念，与“福祉和发展”或“神圣之信托”的概念类似，国际法院在对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中将后两个概念称为“顾名思义是不断演变的”。¹⁸¹ 正如以色列最高法院指出，占领国保障公共生活和秩序责任的具体内容不可能“是十九世纪公共生活和秩序所涵盖的内容”。¹⁸² 至于占领国就被占领土的法律和制度做出规定和实施改变之权力的限度，各方看法各异，但大多数作者似乎认识到，为保障人民的福祉，需要一些前瞻性行动。¹⁸³ 占领持续时间越长，实施某些变化的必要性就越明显，以避免停滞不前，并使占领国能履行占领法规定的义务。¹⁸⁴ 就此应该回顾，对占领国的期望是为造福于被占领人民对

¹⁷⁹ 红十字委员会《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评注》，第 47 条，第 335 页，可查阅：<https://www.icrc.org>。Greenwood 指出，占领国有义务在被占领土设立有效行政机构，见 C. Greenwood, “The administra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 载于 E. Playfair (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ies: Two Decades of Israeli Occupation of the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第 265 页；Benvenisti 认为，占领方可以“在广泛的事务中带来变化”(“Water conflicts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Iraq” (见上文脚注 128), 第 867 页)。

¹⁸⁰ 红十字委员会《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评注》(见上文脚注 179)，第 47 条，第 274 页。

¹⁸¹ 《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对各国的法律后果》(见上文脚注 141)，第 31-32 页，第 53 段。与之类似，见《爱琴海大陆架案(希腊诉土耳其)》，判决书，1978 年 12 月 19 日，1978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 页，第 77 段；其中法院指出，某些通用术语的含义“旨在遵循法律的演变，与特定时期所施行法律赋予该表述的含义相符”。另见 *US-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Complaint by India et al.)* (1998)，世界贸易组织 WT/DS58/AB/R 号文件 (Appellate Body Report)，第 129 段，其中规定，必须根据有关环境保护和养护的当代关切来对“可耗尽自然资源”进行解释(可查阅：<https://docs.wto.org>)；《莱茵铁路，比利时诉荷兰》，2005 年 5 月 24 日仲裁裁决，常设仲裁法院，《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十七卷，第 35-131 页，第 79-81 段。另见委员会关于“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的工作，结论草案 3(“能够随时间演变的条约用语的解释”)评注，《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8/10)，第 39 段。

¹⁸² *A cooperative Society Lawfully Registered in Judea and Samaria Region vs. commander of the IDF Forces in the Judea and Samaria Region et al.*, H.C. 393/82, 37(4) Piskei Din (Reports of the Israel Supreme Court), 785, 部分内容转载于 *Israel Yearbook on Human Rights*, vol. 30 (1984), 第 301-313 页。

¹⁸³ Feilchenfeld 指出，“如果占领持续数年”，则有必要修改税法，并指出“完全无视这些现实很可能对国家福祉造成影响，并最终影响第 43 条含义所指的‘公共秩序和安全’”(见上文脚注 118)，第 49 页。与之类似，见 McDougal and Feliciano(见上文脚注 122)，第 746 页。另见红十字委员会，专家会议……(上文脚注 100)，第 58 页，其中强调了占领国为履行其根据《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所承担的义务或改善被占领土境内公民生活而制定法律的能力。但是，Sassòli, “Legis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and civil life by occupying Powers”(见上文脚注 176)，第 676 页，认为占领国应“仅引入根据其人权义务规定绝对必要之数目的改变”。

¹⁸⁴ 红十字委员会，专家会议……(见上文脚注 100)，第 68 页；Kolb and Vit (见上文脚注 71)，第 194 页。

被占领土进行管理。¹⁸⁵ 第 43 条规定的占领国一般义务，在这个意义上被解释为“确保被占领人民生活尽可能正常的义务”。¹⁸⁶

46. 虽然可能因此需要对被占领土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某些积极主动的干预，但是占领国应该以一定的考虑因素为指导：对被占领土的公共秩序、公民生活和福祉的关切。最值得注意的是，占领国不得依据自身目标修改当地法律，¹⁸⁷ 不可对被占领土的根本制度实施永久性改变。¹⁸⁸ 就这个意义而言，“转化性占领”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¹⁸⁹ 一方面是自然保护主义原则，另一方面是为避免停滞不前可能需要占领国采取的前瞻性行动，无论如何，两者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冲突。即使是稳定的占领，也因其强制性而依然是一种特殊情势，占领国不应取代主权立法机构发挥的作用。自然保护主义原则为占领国在被占领土上的管辖权设定了一般限制，在适用占领法的更具体规则时必须予以考虑。此外，自然保护主义原则还为占领局势下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补充占领法具体规则的方式设定了条件。

47. 鉴于环境保护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国家的核心职能，因此占领国确保被占领土人民在被占领局势下能继续尽可能正常生活的义务与保护环境之间存在明显联系。¹⁹⁰ 此外，从预防和阻止可能造成环境损害行为的角度来看，如破坏供水网和泵站行为(环境署称，此种行为在 2003-2004 年占领期间及之后在伊拉克持续发生)，条款中有关恢复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内容在动荡时期尤为重要。¹⁹¹ 占领持续时间越长，需要占领国为处理环境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可能也就越多样。

48. 另一个相关问题涉及体制崩溃，它往往是武装冲突造成的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认为体制重建是绝对必要的呢？有人指出，一般而言，武装冲突的体制性后果“比战争的直接实际影响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更持久”。¹⁹²

¹⁸⁵ T. Ferraro, “The law of occupation and human rights law: some selected issues”, in R. Kolb and G. Gaggioli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3, pp. 273-293; *The Jerusalem District Electricity Company Ltd. v. (a) Minister of Energy and Infrastructure, (b) Commander of the Judea and Samaria Region* 35(23), H.C. 351/80, Piskei Din 673, 部分内容转载于 *Israel Yearbook on Human Rights* (1981), 第 354-358 页。

¹⁸⁶ Ferraro, “The law of occupation and human rights law...” (见上文脚注), 第 279 页。

¹⁸⁷ 红十字委员会《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评注》(见上文脚注 179), 第 337 页, 第 2 段, (c) 分段; Sassòli, “Legis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and civil life by occupying Powers” (见上文脚注 176), 第 671 页。另见 A. Roberts, “Transformative military occupation: applying the laws of war and human right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0 (2006), 第 580-622 页。

¹⁸⁸ Feilchenfeld(见上文脚注 118), 第 89 页。

¹⁸⁹ 可将转化性占领描述为“主要目标是改革被占领土体制和政治架构的行动”, 见红十字委员会, 专家会议……(上文脚注 100), 第 67 页。它不同于安全理事会授权、可能给目标国家的立法和体制带来意义深远变革的国家建设行动。

¹⁹⁰ K. Conca, *An Unfinished Found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08.

¹⁹¹ 环境署, 《根据文件编写的伊拉克环境研究报告》(见上文脚注 58), 第 71 页。

¹⁹² Conca(见上文脚注 190), 第 95 页。

环境署在其 2003 年有关伊拉克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适当地解决伊拉克的环境问题，必须重建国家、省和地方各级的国家环境治理机构。代表占领国的联盟临时当局为此采取了某些步骤。例如，联盟临时当局设立了一个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会迅速任命了包括一名环境部长在内的一个新内阁；¹⁹³ 这项措施被认为是以长期的可持续方式应对冲突后伊拉克环境挑战的关键。¹⁹⁴ 但应当回顾，占领国在这一具体情况中也应遵循安全理事会的明确要求，以“通过对该领土的有效行政管理促进伊拉克人民的福祉”。¹⁹⁵

49. 有关占领国尊重被占领国法律和体制的要求还值得作为一种环境保障措施来加以关注。占领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为环境提供保护取决于环境和自然资源在国家立法中得到有效保护的程度。可以假定，大多数国家(若非所有国家)都出台了涉及环境保护的法律和规章。¹⁹⁶ 环境权利在一百多个国家的宪法中得到国家一级的承认。¹⁹⁷ 此外，重大多边环境协定也得到许多国家批准，因此可能的情况是，要么被占领国或占领国是协定缔约国，要么它们均为缔约国。¹⁹⁸ 尤其是，如果这些公约已纳入被占领国的法律，那么占领国尊重被占领土法律和制度的义务就会包括其内容。此外，多边环境协定及其所设立的理事机构可在缔约国在确保环境得到保护方面遇到困难的危机和冲突后局势中发挥特殊作用。¹⁹⁹

¹⁹³ 环境署，《伊拉克环境：环境署进度报告》(见上文脚注 58)，第 29 页。

¹⁹⁴ 同上，第 2 页。

¹⁹⁵ S/RES/1483(2003)，第 4 段。

¹⁹⁶ 环境署列出了有关国家环境立法的 1 100 多个例子，见 www.ecolex.org。

¹⁹⁷ 但是，在如何看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方面仍有极大差异，见 P.Sands and J. Pee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4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第 816 页。相关宪法清单可查阅：<http://earthjustice.org/sites/default/files/library/reports/2008-environmental-rights-report.pdf>, Appendix。

¹⁹⁸ 例如：1972 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3 个国家批准)、1973 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3 个国家批准)、1971 年《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197 个国家批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7 个国家批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7 个国家批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86 个国家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7 个国家批准)、《京都议定书》(192 个国家批准)、《巴黎协定》(173 个国家批准)、《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197 个国家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196 个国家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议定书》(104 个国家批准)、2000 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171 个国家批准)、《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公约》(160 个国家批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公约》(182 个国家批准)、《养护野生动物移栖物种公约》(126 个国家批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85 个国家批准)、《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121 个国家批准)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115 个国家批准)。

¹⁹⁹ 见 B. Sjöstedt,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Relation to Armed Conflict: the Role of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Lund University, 2016, 第 221-227 页；Sjöstedt, “The 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treaties 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post-conflict”, 载于 C. Stahn, J. Iverson and J. S. Easterday (e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itions from Conflict to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第 73-92 页。

50. 特别报告员认为，占领国有尊重被占领土环境以及在管理被占领土时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的一般义务。尊重被占领土环境义务的依据可以是源自《海牙章程》第 43 条的占领国有义务维护被占领人民福祉的总体目标。就确保被占领人民在当前局势下尽可能正常生活的义务而言，²⁰⁰ 应将其解释为需要履行环境保护这一得到广泛承认的现代国家公共职能。此外，可以说对环境的关心涉及领土主权的一项根本利益，²⁰¹ 作为临时权力机构的占领国必须予以尊重。正如第二章所述，这样一项一般义务的存在也得到人权法的支持。食物权、健康权和生命权等关键人权与为保障有生命力的健康生态系统而保护土壤质量和水质、甚至是生物多样性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²⁰²

二. 通过国际人权法在占领局势下保护环境

A. 占领法和国际人权法的互补性

51. 人们普遍认为，国际人权法在武装冲突和占领局势下仍然适用。国际法院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中，确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连同《儿童权利公约》都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适用。²⁰³ 国际法院作过一个著名论断：人权公约提供的保护在武装冲突中并没有停止，除非因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4 条所述的那种减损规定造成的结果。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与人权法之间的关系，因此存在三种可能情况：某些权利可能专属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事项；其他权利可能专属于人权法事项；另外一些法律可能专属于国际法这两种分支的事项。为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本法院必须考虑到国际法的这两种分支，即人权法和作为特别法的国际人道主义法。²⁰⁴

52. 国际法院在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中确认，国际人权文书适用于一国对其领土以外地区、“特别是被占领土”²⁰⁵ 进行管辖时作出的行为。人权法在占领期间

²⁰⁰ Ferraro, “The law of occupation and human rights law...” (见上文脚注 185), 第 279 页。

²⁰¹ 《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匈牙利诉斯洛伐克)案, 判决书, 199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7 页, 第 53 段。

²⁰² 见世界卫生组织, 题为“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未来: 人类健康与里约各公约: 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荒漠化”的讨论文件(2012 年), 第 2 页, 其中确认生物多样性所发挥的“人类健康的基础”的作用。可查阅: www.who.int/globalchange/publications/reports/health_ricoconventions.pdf。

²⁰³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见上文脚注 77), 第 178-181 页, 第 107-113 段。

²⁰⁴ 同上, 第 178 页, 第 106 段。

²⁰⁵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见上文脚注 82), 第 242-243 页, 第 216 段。另见第 345(3)段, 法院在该段似乎暗示, 人权在武装冲突和占领局势下的适用有区别; Dinstein(上文脚注 81), p. 88, para. 200。

适用，这已进一步得到区域法院、²⁰⁶ 人权事务委员会、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²⁰⁷ 的认可，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学术著作的支持。²⁰⁸

53. 人权事务委员会表示，一旦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下获得人权保障，则此一保障即随领土转移并持续归人民所有，而不论缔约国政府是否更迭。²⁰⁹ 此项原则与下列要求一脉相承：占领国尊重被占领土的法律和制度，只要该等法律和制度不与既有人权标准抵触。一般来说，占领国还受自身人权义务和习惯国际法的约束。记得国际法院曾认定以色列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下的义务对其在被占领的西岸的行为适用。²¹⁰ 在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中，法院提到一些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占领国乌干达同为缔约国的人权文书。²¹¹ 同样，欧洲人权法院认定，《欧洲人权公约》对联合王国作为占领国在伊拉克境内实施的行为适用。²¹²

²⁰⁶ 例如，见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Loizidou v. Turkey*,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of 23 March 1995 (上文脚注 106), para. 62, and Judgment (Merits) of 18 December 1996 (上文脚注 102, para. 52; *Cyprus v. Turkey* (上文脚注 106, p. 25, para. 77; *Al-Skeini and others v.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55721/07, Judgment of 7 July 2011, para. 94, 其中提到美洲人权法院的案件，即 *Mapiripán Massacre v. Colombia*, Judgment of 15 September 2005, Series C., No. 134, 支持说明调查关于在武装冲突和占领局势下侵犯生命权的指控之义务。

²⁰⁷ 人权事务委员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6 号一般性意见：义务的延续性，1997 年 12 月 8 日，[CCPR/C/21/Rev.1/Add.8/Rev.1](#)，第 4 段；《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9 号一般性意见：第 4 条(紧急状态期间的克减问题)，2001 年 8 月 31 日，[CCPR/C/21/Rev.1/Add.11](#)，第 3 段；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2004 年 5 月 26 日，[CCPR/C/21/Rev.1/Add.13](#)，第 10 段。另见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结论性意见：以色列，[E/C.12/1/Add.69](#)，2001 年 8 月 31 日；结论性意见：以色列，[E/C.12/ISR/CO/3](#)，2011 年 12 月 16 日；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瓦尔特·凯林先生根据委员会第 1991/67 号决议编写的关于伊拉克占领下的科威特的人权情况的报告，[E/CN.4/1992/26](#)，1992 年 6 月 16 日。

²⁰⁸ 例如，见 *Dinstein* (上文脚注 81), pp. 69–71; *Kolb and Vité* (上文脚注 71), pp. 299–32; A. Roberts, “Transformative military occupation” (上文脚注 187, pp. 580–622; J. Cerone, “Human dignity in the line of fire: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during armed conflict, occupation, and peace operations”,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 39 (2006, pp. 1447–1610; Benvenisti,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Occupation* (上文脚注 86), pp. 12–16; Y. Arai-Takahashi, *The Law of Occupa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Leiden, Brill 2009; N. Lubell,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in military occup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4, No. 885 (2012, pp. 317–337; Ferraro, “The law of occupation and human rights law...” (上文脚注 185), pp. 273–293; and M. Bothe, “The administra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y” (上文脚注 129)。不同观点见 M. J. Dennis, “Application of human rights treaties extraterritorially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and military occu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9 (2005, pp. 119–141)。

²⁰⁹ 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6 号一般性意见(上文脚注 207)，第 4 段。另见《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26 页，第 25 段，其中法院表示，保护不因在战争时期而停止，除非援引与克减有关的条款。

²¹⁰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见上文脚注 77)，第 102–113 段。

²¹¹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见上文脚注 82)，第 243–244 页，第 217 段和第 219 段。

²¹² *Al-Skeini v. United Kingdom* (见上文脚注 206), paras. 149–150。

54. 人权法的同时适用与占领局势尤其相关。国际法院曾有一条著名的解释，即尊重国际人权法中适用的规则，系《海牙章程》第 43 条规定占领国承担的部分义务。²¹³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同样表示，把敌对阶段和占领局势区别对待，“加诸于占领国的义务比加诸于国际武装冲突当事方的义务更为繁苛”。²¹⁴ 此外，欧洲人权法院在若干判决中明确说，《欧洲人权公约》适用于一缔约国对其国家领土以外的一个地区行使有效控制的情形。欧洲人权法院表示，“在这块地区维护《公约》中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的义务是根据控制这样一个事实”。²¹⁵ 因此，人权法非但适用于占领局势，而且在占领期间的作用似乎大于在敌对阶段的作用。

55. 人们普遍认为人权法对武装冲突的情况适用，但也同样赞成适用须加限制，兼顾武装冲突法的具体规定。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就此提醒，不要太过轻易地接纳出自不同法律背景的概念和理念。尽管人权法领域文书和惯例与国际人道主义法有着相似的目标、价值观和术语，²¹⁶ 诉诸不无道理，但是，审判分庭补充说，“人权领域发展出来的理念只有在考虑到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独特之处时，才能移植到这后一类法律”。²¹⁷

56. 此外，占领国为履行人权义务采取行动的空间，还受到法律和事实上的限制。法律限制的来源之一，就是尊重被占领土法律和制度之义务中固有的自然保护主义原则。占领国属于相关领土的临时当局，只有管理国地位，但不该试图改变领土主权。事实限制也许与安全局势变幻莫测有关。占领是介于侵略和冲突结束的一个中间阶段，其特征或许就是不稳定，而且起码要持续到占领国对领土的控制得到巩固。另外，可能还要受到物质限制。按照一般规则，占领国可以使用被占领领土的资源来负担占领成本、造福民众。占领国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利用自身资源促进被占领土的发展，则不甚明朗。²¹⁸

57. 占领法提供了一个专门用于占领局势的特别法律制度。特别是，它兼顾了占领国的军事和安全利益、领土主权的利益和被占领土民众的利益。因此，将占领法视为特别法，是评定其与别种法律之间互动关系的出发点。上文引用了国际法院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里的一段

²¹³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见上文脚注 82)，第 231 页，第 178 段。

²¹⁴ 《检察官诉纳莱迪里奇和马丁诺维奇》(见上文脚注 76)，第 214 段。

²¹⁵ *Al-Skeini v. United Kingdom* (见上文脚注 206)，para. 138; *Loizidou v. Turkey*,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of 23 March 1995 (上文脚注 106)，para. 62, and Judgment (Merits) of 18 December 1996 (上文脚注 102, para. 52; *Cyprus v. Turkey* (见上文脚注 106), pp. 24–25, para. 76; *Ilaşcu and others v. Moldova and Russia*, Application No. 48787/99, Judgment of 8 July 2004, paras. 314–316。

²¹⁶ 《检察官诉德拉戈柳布·库纳拉奇、拉多米尔·科瓦奇和佐兰·武科维奇，案件编号：IT-96-23-T 和 IT-96-23/1-T，2001 年 2 月 22 日判决》，第 467 段。

²¹⁷ 同上，第 471 段。

²¹⁸ 见 Benvenisti, “Water conflicts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Iraq” (上文脚注 128)，p. 868; Lubell (上文脚注 208)，pp. 332–334; and H. Cuyckens, *Revisiting the Law of Occupation*, Leiden, Brill/Nijhoff, 2017, pp. 197–198。

陈述，²¹⁹ 从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国际人道主义法是特别法，但这一地位并不说明它在所有事务中一概优于国际人权法。第二，特别法的概念不适用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之间的一般关系。仅当相对于特定规范时，才能确定人权法的补充作用。²²⁰ 同样，“在某种情况下，两条规则的适用范围(属物、属地、属时、属人)重叠，其中蕴含的指令或标准却背道而行，它们就只能是相互冲突的”。²²¹ 第三，即便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同时适用，相关规则也未必需要排出先后。

58. 正如委员会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组所指出的，特别法的规范效力“完全取决于所阐述的规范性考虑因素：对具体情况的敏感性、反映国家意志的能力、具体性、清晰性、明确性”。²²² 在许多涉及占领局势的问题中，占领法规则与人权法相应规则的特点完全相仿。但是，占领法更适于占领的特有情形：临时性质、高压政治、时有动荡。当局势更为固化、特别是占领持续时间较长时，占领法的局限就开始突显。从渊源来看，占领法旨在提供一个必要的监管框架，以供他国临时对地位即将在和平协定中予以明确的领土行使权力。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占领法属于“紧急状态法”。²²³ 在类和平状态下，《海牙章程》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就恢复、持续保持公共秩序和公民生活而言，能给占领国的指导较少。²²⁴

59. 在占领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制同一主体、朝向同一目标的情况下，或可利用其中一支法律充实、深化另一支法律的规则。有时，人权法的规定可能更清楚、更详细，而且适用于所涉现实情况。²²⁵ 例如，人权法可以为解释“公民生活”的概念提供依据，或更加确切地界定国家在保障“公共卫生”方面的义务。这也可能包括环境问题，但前提是民众福祉因此受到影响。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套规则虽指向同一主体，但涉及的要素不同，而且要素之间相互补充。兹举一

²¹⁹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见上文脚注 77)，第 106 段。

²²⁰ Dinstein(见上文脚注 81, p. 88; M. Milanovic,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Human Rights Trea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32-234; A. Lindroos, “Addressing norm conflicts in a fragmented legal system: the doctrines of *lex specialis*”,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4 (2005), pp. 27-66, at p. 44.

²²¹ J. d’Aspremont and E. Thranchez, “The quest for a non-conflictual co-existenc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humanitarian law: which role for the *lex specialis* principle?”, in R. Kolb and G. Gaggioli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3, pp. 223-250, at p. 225.

²²² 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研究组编写的分析研究报告(A/CN.4/L.682, Corr.1 和 Add.1)，第 119 段。

²²³ Kolb and Vité(见上文脚注 71)，p. 114.

²²⁴ 同上，p.411：“conçu pour être une réglementation de transition sur le court terme, le droit d’occupation n’envisage pas la question des conditions minimales d’existence au-delà du devoir d’assistance aux personnes en difficulté (占领法属于短期过渡性规定，在援助困难民众的义务之外，并不考虑最低生活条件的问题)”。

²²⁵ 红十字委员会，专家会议……(见上文脚注 100, p.8，建议在占领法不涉及、不清楚、不明确的事项上，用国际人权法作为占领法的补充。

例，加以说明：《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保护对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前者提供的保护可从后者的这一规定得到补充和加强。²²⁶ 如果前面“不可缺少的物体”一词必须结合紧急状态理解，那么后面的“生存手段”一词则可囊括对特定自然资源的长期依赖，这样就能更加有力地保护特定自然资源免遭过度开采。²²⁷ 然而，不论何时，关于占领国的行为，譬如权力的临时性质、尊重现有法律和制度之义务等，其一般框架仍由占领法提供。

60. 这并不是说国际人权法和占领法的指向总是相同。例如，出于维持公共秩序和安全之需要，占领国可临时拘禁平民，²²⁸ 而人权法却未对行动自由作出类似限制。该等措施在多长时间系属正当，取决于安全局势的发展情况。²²⁹ 又如，在长期占领过程中，就财产权和土地权而言，占领法和人权法涉及的标的固然相同，产生的结果却不一样。²³⁰ 占领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力度特别大，人权法却允许从平衡和相称的角度出发，限制该等权利。²³¹

61.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与占领局势似乎尤其相关。第一，在国际和区域判例中，该等权利已与领土控制绑定。²³² 第二，可以提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和占领法两者在人民福祉等目标上的共同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占领法条文的实质内容也有相当多重叠之处。第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逐步实现相关权利，并且承认资源有限。同样，根据《海牙章程》第43条，占领国有义务恢复和维持公共秩序与公民生活，包括公共福利，这属于行为义务，不要求占领国取得特定结果。²³³ 然而，缔约国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权利负有某些直接义务，例如保证权利的行使不受任何歧

²²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条第2款；《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条第2款。

²²⁷ 见 Dam-de Jong(上文脚注 128)，p. 238。

²²⁸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第78条。

²²⁹ 同上，第46条。

²³⁰ Gross,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 (见上文脚注 91，p. 339-396，其中提到欧洲人权法院关于北塞浦路斯的判例法和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判例法。

²³¹ 同上，第389页。

²³²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见上文脚注 77)，第112段；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判例法，见上文脚注 215。

²³³ 红十字委员会，《2016年……第2条评注》(见上文脚注 75)，第322段。

视、²³⁴ 采取步骤争取充分实现相关权利等。²³⁵ 此类措施必须是具体的、有意义的。²³⁶

62. 此外，在人权法中，“尊重”属于消极义务，“保护”和“确保”属于积极义务，两者有别，²³⁷ 在占领法中也有相对应的差别。根据占领法，消极义务(大多是禁止性的)立即适用，而积极义务的履行则取决于“控制的程度、占领初期存在的局限以及外国部队掌握的资源”。²³⁸ 所以，占领国承担的责任“与占领持续的时间相当”。²³⁹ 同样，有人指出积极的人权义务与消极义务不同，“仅当国家理应按其权力、控制和资源水平采取积极措施时”，才可在域外适用。²⁴⁰

B. 环境与人权：健康权

63. 人权和环保相互交织，已经得到广泛承认。²⁴¹ 主要人权条约鲜有提及环境，是因为其中大多在制定时，环境尚未受到广泛关注。不过，相关公约在适用上的确是注重环境的。此外，鉴于多边环境协定缺乏申诉程序，人权法庭已成为寻求补救环境损害的首选途径。²⁴² 环保和人权之间的联系也在人权条约机构的判例和惯例中得到了发展。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结论性意见中，从农耕、工业和采掘活动所引发的污染切入，对食物权进行了解释。²⁴³ 此外，食物权还涉及土著社区传统拥有的自然资源枯竭问题。²⁴⁴

²³⁴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2 条第 2 款。

²³⁵ 同上，第 2 条第 1 款。

²³⁶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第 30 段。

²³⁷ 例如，见 O. De Schutt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Cases, Materials, Commenta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80-295。

²³⁸ 红十字委员会，《2016 年……第 2 条评注》(见上文脚注 75，第 322 段)。

²³⁹ 同上。

²⁴⁰ Cerone(见上文脚注 208)，p. 1505，分析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

²⁴¹ 见与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独立专家约翰·诺克斯的最后报告，2018 年 1 月 24 日(A/HRC/37/59)。

²⁴² D. Shelt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substantive rights”, in M. Fitzmaurice, D. M. Ong and P. Merkouris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1。但是，见近期寻求确立更大环境参与权的一项举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关于在环境事务方面获取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司法的区域协定》，可查阅：www.cepal.org/en/publications/39051-text-compiled-presiding-officers-incorporating-language-proposals-countries。

²⁴³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俄罗斯联邦，1997 年 5 月 20 日，联合国文件 E/C.12/1/Add.13，第 24 段，委员会在文中对以下问题表示严重关切：食物污染达到如此比例，原因似乎是“杀虫剂使用不当，而且由于重金属和溢油处理不当等原因引发了环境污染”。

²⁴⁴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二十届和第二十一届会议报告，审议缔约国的报告：喀麦隆(1999 年)，E/C.12/1999/11，第 337 段；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四十二届和第四十三届会议报告，审议缔约国的报告：马达加斯加(2009 年)，E/C.12/2009/3，第 372 段；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四十六届和第四十七届会议报告，审议缔约国的报告：阿根廷(2011 年)，E/C.12/2011/3，第 268 段；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三十八届和第三十九届会议报告，审议缔约国的报告：巴拉圭(2007 年)，E/C.12/2007/3，第 436 段。

64. 环境退化可能与生命权、私人和家庭生活权、健康权、食物权等一些人权受到侵害的情况存在关联。过去 20 年，相关判例法在国家 and 区域一级大量涌现。关于生命权，可提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法院在对社会经济权利和问责项目诉尼日利亚案作出的裁决，法院在其中申明“人类生活的质量取决于环境的质量”。²⁴⁵ 美洲人权法院在雅诺玛米诉巴西案中承认，健康的环境与生命权相互联系。²⁴⁶ 欧洲人权法院在 *Öneryildiz* 诉土耳其案中认为，生命权因市垃圾场甲烷爆炸受到损害。²⁴⁷ 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中，私人生活权是环境相关案件中最常用到的理由之一。²⁴⁸ 美洲人权法院近期应请求，就如何从国际环境法的角度看待生命权和人格完整权出具咨询意见，在结论中表示享受健康环境之权利系属基本人权。²⁴⁹ 然而，人们常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为基础，考虑“实质性环境标准和条件是否保持在令人满意的水平”。²⁵⁰ 下面几段重点讨论健康权——人权和环保之间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环。

65. 占领法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规定比较基础。根据《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第 56 条，占领国“在其所有方法之最大限度内”，有责任“依国家与地方当局之合作，保证并维持占领地内之医疗与医院设置与服务，公共保健与卫生之义务，尤其是采取扑灭传染病与流行病传播[……]的措施”。另据 2016 年红十字委员会《评注》，该条的明确重点是敌对行动的直接后果以及营养不良、流离失所和卫生状况不良引起的迫切健康风险。与此同时，占领国恢复和维持公共秩序和公民生活的一般义务，以及第 56 条关于确保和维持被占领土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和清洁的表述，意味着一旦此类风险减轻，占领国还应当立即开始关注更多长期的公共卫生问题。²⁵¹ 解释和落实健康权的惯例，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占领国公共卫生义务一般可能涉及的内容。这一考虑从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观点出发，着重指出了人权法在占领局势中的辅助作用

²⁴⁵ *Socio-Economic Rights and Accountability Project (SERAP) v. Nigeria*, document No. ECW/CCJ/JUD/18/12. (ECOWAS Court of Justice 2012, para. 100. 法院处理相关主张时依据的是《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二十四条(享有健康环境之权利)而非第四条(生命权), 27 June 1981, OAU document CAB/LEG/76/3 rev.5, I.L.M. vol. 21 (1982), p.58.

²⁴⁶ *Yanomami v. Brazil*, 5 March 1985, IACHR Resolution No. 12/85, Case No. 7615, Resolution 1.

²⁴⁷ *Öneryildiz v. Turkey*, Application No. 48939/99, Judgment of 30 November 2004, para. 71.

²⁴⁸ 《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从环境问题入手对这一权利加以解释的相关判例法十分丰富，例如，见 *Powell and Rayner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9310/81, Judgment of 21 February 1990; *López Ostra v. Spain*, Application No. 16798/90, Judgment of 9 December 1994; *Guerra and Others v. Italy*, Application No.116/1996/735/532, Judgment of 19 February 1998; and *Fadeyeva v. Russia*, Application No. 55723/00, Judgment of 9 June 2005.

²⁴⁹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Rights, Advisory Opinion OC-23/17 of 15 November 2017*,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Series A, No. 23, paras.55 and 59. 咨询意见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发表，可查阅：www.corteidh.or.cr/docs/opiniones/seriea_23_esp.pdf.

²⁵⁰ *Sands and Peel*(见上文脚注 197), p. 817.

²⁵¹ 见 *Lubell*(上文脚注 208), pp.317-337.

66. 健康权已被纳入若干国际人权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²⁵² 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²⁵³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进一步解释道，“健康权包括多方面的社会经济因素，促进使人民可以享有健康生活的条件，包括各种健康的基本决定因素，如食物和营养、住房、使用安全饮水和得到适当的卫生条件、安全而有益健康的工作条件，和有益健康的环境。”²⁵⁴ 在关于“享有健康的自然和工作场所环境的权利”的意见中，²⁵⁵ 该委员会还指出该权利除其他外，包括“防止和减少居民接触如放射性物质和有害化学物质等有害物质，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健康的有害环境条件的风险。”²⁵⁶ 与环境的联系还明显体现在同一意见对 1972 年《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引述中。²⁵⁷ 在其他工作中，委员会确认了享有健康权与环境退化、²⁵⁸ 环境污染²⁵⁹ 和土著居民传统居住地区自然资源枯竭²⁶⁰ 之间的相互联系。

67. 《儿童权利公约》也将健康权与环境具体联系起来。²⁶¹ 在有关的一般性意见中，儿童权利委员会指出，“各国应当采取措施处理地方环境污染在所有环境下对儿童健康构成的危险和风险”。²⁶² 环境污染问题及其与健康权的联系经常在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中被述及，但有时粗略有时详细。²⁶³ 还着重指出了武装冲突对儿童健康权的影响，例如战争遗留的有毒物质“在冲突结束后会在很长时

²⁵² 《世界人权宣言》，[A/RES/217 A](#)，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²⁵³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

²⁵⁴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第 4 段。

²⁵⁵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二(乙)。

²⁵⁶ 同上，第 15 段。

²⁵⁷ 《人类环境宣言》，载于《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报告书》，1972 年 6 月 16 日，[A/CONF.48/14](#)，二和 [Corr. 1](#)(斯德哥尔摩宣言)原则一：“人人都有在过着尊严和幸福生活的优良环境里享受自由、平等和适当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²⁵⁸ 例如，见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结论性意见：乌兹别克斯坦，2006 年 1 月 24 日，[E/C.12/UZB/CO/1](#)，第 28 段。

²⁵⁹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第 15 段。

²⁶⁰ 例如，见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三十二届和第三十三届会议报告，审议缔约国的报告：厄瓜多尔(2004 年)，[E/C.12/2004/9](#)，第 278 段；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二十五届、第二十六届和第二十七届会议报告，审议缔约国的报告：委内瑞拉(2001 年)，[E/C.12/2001/17](#)，第 85 段。

²⁶¹ 第 24 条。

²⁶²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5 号一般性意见，“儿童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的权利”，2013 年 4 月 17 日，[CRC/C/GC/15](#)，第 49-50 段。

²⁶³ 例如，见儿童权利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报告，2003 年 10 月 23 日，[CRC/C/132](#)，第 434 段；儿童权利委员会结论性意见：孟加拉国，2003 年 10 月 27 日，[CRC/C/15/Add.221](#)，第 53 段。

间里对当地社区造成痛苦”。²⁶⁴ 在伊拉克，“独立开展的研究表明，在冲突地区，有出生缺陷的儿童大幅度增加，而这些儿童在很多情况下得不到医治”。²⁶⁵

68. 另外，某些区域人权条约纳入了健康权的概念，甚至是健康环境权的概念。例如，《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纳入了健康权，还明文纳入了健康环境权。²⁶⁶ 社会和经济权利行动中心及另一人诉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案(奥戈尼兰德案)²⁶⁷ 和社会经济权利与问责项目诉尼日利亚案均诉诸这一权利。在前一案件中，关于一家石油企业集团的业务活动引起环境退化和有关的健康问题一事，非盟委员会认为上述条文“就环境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和安全而言，承认与经济社会权利紧密相连的清洁安全环境的重要性”。²⁶⁸ 在后一案件中，关于尼日尔河三角洲石油勘探和有关的环境退化问题，西非经共体法院认定健康环境权受到侵犯，并申明“众所周知，溢油事件污染水体、损害水生动植物、影响土壤肥力，对附近居民的健康和生计造成不良后果”。²⁶⁹ 《〈美洲人权公约〉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附加议定书》(《圣萨尔瓦多议定书》)同样纳入了健康权。²⁷⁰ 区域判例确认健康权包括环境保护要素，如无污染的环境。²⁷¹ 此外，一些多边环境协定确认，人类生活和健康可能受到环境危害的影响。²⁷²

69. 多项不具有约束力的文件将人类健康权与环境保护互相联系起来。例如在亚洲，《东盟人权宣言》将健康环境权作为适当生活水准权的一项要素纳入。²⁷³ 此外，2004年《阿拉伯人权宪章》确认健康环境权是适当生活水准权的一项要

²⁶⁴ 危险物质及废料的无害环境管理和处置对人权的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2016年8月2日，A/HRC/33/41，第16段。

²⁶⁵ 同上。

²⁶⁶ 第16(1)条(健康权)，第24条(享有对[个人]发展有利的总体令人满意的环境之权)。

²⁶⁷ 社会和经济权利行动中心及另一人诉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案，第155/96号来文(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2001年)。

²⁶⁸ 同上，第50段。

²⁶⁹ 社会经济权利与问责项目案，第96段。

²⁷⁰ 《〈美洲人权公约〉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附加议定书》(1988年11月17日，圣萨尔瓦多)，美洲国家组织，《条约汇编》，第69号。

²⁷¹ 见 IACHR Annual Report 1984-85, Chapter V, Areas in which Further Steps are Needed to Give Effect to the Human Rights Set Forth in 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Man and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OEA/Ser.L/V/II.66; 另见 IACHR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Cuba, 4 October 1983, OEA/Ser.L/V/II.61, Doc.29 rev. 1, Chap.XIII (*The Right to Health*), para. 41; Case No. 7615; *Indigenous Community Yakye Axa v. Paraguay*, Merits, Reparations, and Costs Judgment of 17 June 2005, (Series C No. 125), para. 167.

²⁷² 例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条；《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序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条；《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序言，第一条；《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序言、第1、3、6、9-11和13条；《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序言、第一、三至五、十二、十六至十九条。

²⁷³ 《东盟人权宣言》，2012年11月18日(第28(f)段)，可查阅：www.asean.org/storage/images/ASEAN_RTK_2014/6_AHRD_Booklet.pdf。另见《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宣言》，2017年9月14日，E/ESCAP/MCED(7)/5，第13和19段，可查阅：www.apministerialenv.org/document/MCED_5E.pdf 和仰光可持续发展决议，2003年12月18日，可查阅：<http://asean.org/yangon-resolution-on-sustainable-development-2>。

素。²⁷⁴ 《美洲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确认，每个人都有权“通过与食品、衣物、住房和医疗有关的卫生和社会手段维持自己的健康”。²⁷⁵ 此外，《斯德哥尔摩宣言》²⁷⁶ 和 1989 年《欧洲环境与健康宪章》²⁷⁷ 也确认了健康权及其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另外，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的工作也涉及健康权和环境之间的联系，²⁷⁸ 各国在普遍定期审议中讨论了健康环境权以及健康权与环境保护的联系。²⁷⁹

70. 以上概述表明，健康权和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得到全世界的普遍承认。就污染或资源耗竭等环境退化问题威胁公共卫生而言，各国有关的人权义务不限于及时适当提供医疗，还延伸到保护环境的措施。在这方面，有人指出“缺乏不含毒物或其他污染物的饮用水，重金属或放射性物质污染大气，或在居民家附近倾倒在危险或有毒废物”均可被视为对基本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侵犯。²⁸⁰ 区域人权法庭的日益发展的案例法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认定侵犯人的实质性人权行为在环境退化方面所必须达到的临界值。²⁸¹ 不过，设立“实际的环境标准，包括空气

²⁷⁴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人权宪章》(2004 年 5 月 22 日)，第 38 和 39(2)条，转载于国际人权报告，第 12 卷(2005 年)，第 893 页。

²⁷⁵ 《美洲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美洲国家组织第 XXX 号决议(1948 年 5 月 2 日)，转载于 Basic Documents Pertaining to Human Rights in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OAS/Ser.L/V/II.4 Rev. 9 (2003), Article XI。另见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Ma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rticle 64 of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dvisory Opinion OC-10/89, 14 July 1989,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Ser.A), No. 10 (1989)*。

²⁷⁶ 《斯德哥尔摩宣言》(见上文脚注 257)，序言和原则七。

²⁷⁷ 《欧洲环境与健康宪章》，第一届欧洲环境与健康会议上通过，1989 年 12 月 7 日至 8 日，法兰克福，序言。

²⁷⁸ 例如，见特别报告员保罗·亨特关于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的报告，[E/CN.4/2003/58](#)，第 23 段；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暴力侵害妇女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负责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权事务秘书长代表、适足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房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教育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人权与赤贫问题独立专家根据 S-9/1 号决议所作关于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的综合报告，2009 年 5 月 29 日，[A/HRC/10/22](#)，第 54 段。

²⁷⁹ 与享有安全、清洁、卫生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问题摸底，大会和人权理事会个别报告，包括普遍定期审议进程，第 6 号报告，2013 年 12 月，第 3.C 部分。另见有安全、洁净、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相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独立专家约翰·诺克斯的报告，2013 年 12 月 30 日，[A/HRC/25/53](#)。

²⁸⁰ Sands and Peel(见上文脚注 197)，第 818 页。

²⁸¹ 例如，见亚诺玛米人诉巴西案、Öneryildiz 诉土耳其案、Lopez Ostra 诉西班牙案、Guerra 等人诉意大利案、Fadeyeva 诉俄罗斯案、社会和经济权利行动中心案和社会经济权利与问责项目案，以及上文讨论的美洲人权法院环境和人权咨询意见。另见 R.Pavoni, “Environmental jurisprudence of the European and Inter-American Courts of Human Rights: Comparative insights”, in B. Boer, *Environmental Law Dimensions of Human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69-106。

质量、全球气候、淡水质量、海洋污染、废物、有毒物质、保护区、养护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标准”的需要已经得到了确认。²⁸²

71. 另一个问题涉及如何可能需要在武装冲突和占领局势下调整这些临界值或标准。在这方面应当回顾，健康权与所有人权一样，向人权条约缔约国规定了三层义务。²⁸³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认为，“尊重”义务要求各国不直接或间接干预人们享有健康权。“保护”义务要求各国采取措施，防止第三方干预。最后，“实现”义务要求各国采取适当措施，充分实现健康权。²⁸⁴ 就尊重健康权的义务而言，委员会解释称，各国除其他外，应当“避免非法污染空气、水和土壤，例如有设施排放工业废物”。²⁸⁵ 此外，各国不应“隐瞒或故意错报与健康有关的信息”，不应“阻止人们参与健康方面的事务”。²⁸⁶ “实现”义务要求缔约国除其他外，在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中充分承认健康权。这还包括要求缔约国针对环境健康危害等风险采取措施。为此，各国“应制定和执行减少或消除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的国家政策，包括重金属的污染，如汽油中的铅”。²⁸⁷

72. 正如上文所指出，《公约》提出应逐步落实权利，并且承认现有资源有限造成了制约。对占领国而言，现有资源的概念可指占领方从被占领土取得、可用作占领支出并用于被占领民众福祉的收入。占领国是否应当使用自己的资源，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自己的资源，取决于几个考虑因素。²⁸⁸ 占领国积极行动(包括立法行动)的其他限制来自自然保护主义原则。虽然这项原则可能被视为“具有足够弹性”，在需要维护安全、确保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或满足人口需求的前提下，为符合新形势的立法留出了空间，²⁸⁹ 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占领的性质和持续时间。此外，由于此类前瞻性行动的目标有限，在长期占领的情况下，不妨让当地民众参与决策进程。

73. 考虑到占领局势的暂时性涉及实质和法律上的限制，可以得出结论，制订和实施国家环境政策是不可行的，甚至不是占领国的理想目标，至少在没有被占领民众参与的情况下如此。同时，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实现健康权，不应理解为所有

²⁸² 见 2018 年 1 月 24 日与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独立专家约翰·诺克斯的最后报告(A/HRC/37/59)，框架原则 11，评注，第 31 段。

²⁸³ 见上文脚注 235。

²⁸⁴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第 33 段。

²⁸⁵ 同上，第 34 段。

²⁸⁶ 同上。

²⁸⁷ 同上，第 36 段。

²⁸⁸ 见上文脚注 218。

²⁸⁹ Dinstein(见上文脚注 81)，第 112-116 页。

有重要内涵的缔约国义务都不存在。²⁹⁰ 此外，占领国承担的义务应当不断增加，以“与占领持续时间相称”。²⁹¹

74. 就占领初期而言，占领国的义务似乎主要在“尊重”范围内，如不应做出严重损害环境和公共健康的行为。²⁹² 此外，占领国的公共健康优先事项可包括保护居民不受有毒物质、水污染或石油污染的不良健康影响，或者免于承受武装冲突损害环境引起的其他健康风险。²⁹³

75.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了伊拉克联盟临时当局作为占领国代表试图应对一些具有明显健康影响的迫切环境问题的情况。环境署认为，冲突期间废物管理系统失灵“导致人们因为收集系统失灵、抢劫或受到限制等原因不受控制地随意在街道上倾倒城市废物”。此外，这场冲突“产生了大量被炸毁建筑的废弃物(可能受到贫化铀和石棉的影响)和军事装备(车辆、未爆弹药、贫化铀)”。²⁹⁴ 环境署报告称，联盟临时当局启动应急废弃物收集工作，“清理了巴格达街道和街区的100多万立方米废弃物”。²⁹⁵ 另外，“联盟临时当局开始对巴格达被炸毁的建筑物进行结构评估和拆除/清除”。²⁹⁶ 此外，联盟临时当局宣布当时正在直接通过伊拉克工程部资助一项废弃物管理方案，该方案临时雇用100 000人收集和清理街头和污水网的废物。²⁹⁷

76. 在更为稳定的占领局势中，根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建议，有关的消极义务至少可包括不应非法污染空气、水和土壤，不得隐瞒与公共健康有关的环境信息。²⁹⁸ 然而，不应将此理解为占领国必须为占领前领土主权机关的政策决定负责。例如，如果被占领土的经济依赖污染性行业，那么彻底翻修生产基础设施将超出占领国作为临时管理者的能力范围。但在长期的占领中，有理由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以防止出现停滞。²⁹⁹

²⁹⁰ 见上文脚注 235。

²⁹¹ 红十字委员会，专家会议……(上文脚注 100)。

²⁹² 联合国关于伊拉克占领下的科威特人权情况的报告称，“武装冲突期间，故意引起大规模环境损害，严重影响较大比例有关居民的健康，或给后代人的健康带来风险”，等同于严重侵犯健康权(见上文脚注 207，第 53 页)。

²⁹³ 例如，见 Hulme(上文脚注 65)，第 119-142 页。

²⁹⁴ 环境署，《伊拉克的环境：环境署的进度报告》(见上文脚注 58)，第 16 页。

²⁹⁵ 同上。

²⁹⁶ 同上。

²⁹⁷ 同上，第 17 页。

²⁹⁸ 见上文脚注 236。

²⁹⁹ 见上文第 43-46 段。

三. 国际环境法在占领局势中的作用

A. 国际环境法的补充作用

77. 比起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学者和国际性法院和法庭对武装冲突局势下国际环境法的适用性问题的关注要少得多。在这方面，国际法院 1996 年关于核武器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为习惯国际环境法继续适用于武装冲突局势的主张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法院认为，虽然与保护和保障环境有关的现有国际法并不特别禁止使用核武器，但它指出，在落实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时，应当适当考虑重要的环境因素。³⁰⁰

78. 委员会 2011 年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条款草案表明，关于对环境进行国际保护的条约、关于国际水道或含水层的条约以及多边造法条约可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施行。³⁰¹ 虽然，将此类条约列入指示性清单只是根据有关条约的主题事项创建“一套可反驳的推定”，³⁰² 但是，委员会指出，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意见“对环境条约适用于武装冲突情况的推定提供了一般和间接的支持”。³⁰³ 就关于水道和含水层的条约而言，还可提及委员会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和“跨界含水层法”专题的条款草案。³⁰⁴ 至于造法条约，相关评注提到此类条约的非政治性质、其预期永久性以及国家惯例。³⁰⁵ 这些理由似乎也与多边环境协定有关。此外，若此类条约针对具有跨界性质或全球范围的环境问题，且条约获得广泛批准，可能难以想象仅在

³⁰⁰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26 页，第 33 段。

³⁰¹ 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条款草案，《201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07-130 页，第 100-101 段。

³⁰² 同上，第 120 页，附件评注第(2)段。

³⁰³ 同上，第 127 页，附件评注第(55)段。

³⁰⁴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条款草案及其评注和关于跨界封闭地下水的决议，第 29 条的评注，第 3 段，《1994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88-135 页，第 210-222 段。“当然这些条款本身即使在武装冲突期间也还是有效的。因此在这期间水道国依然有义务按照本条款保护和利用国际水道和有关工程。但是，战事可能影响到国际水道和水道国对水道的保护和利用。在这种情形下，第 29 条载明，规制武装冲突的规则和原则应予适用。”另见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及其评注，《2008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9-43 页，第 53-54 段，第 18 条的评注，第 3 段：“在武装冲突期间，含水层国按照本条款草案规定而保护和利用跨界含水层及有关工程的义务仍然有效。但战争不仅会影响跨界含水层，而且也会影响含水层国对其的保护和利用。在此情况下，条款草案 18 明确指出，关于武装冲突的规则和原则适用”。

³⁰⁵ 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条款草案，附件，第 15-21 段。

冲突各方之间中止施行。³⁰⁶ 可以说，此类条约规定的义务是为了保护集体利益，是对冲突或占领所涉国家以外的更大范围国家集团承担的义务。³⁰⁷

79. 此外，红十字委员会关于武装冲突中环境保护的准则指出，“国际环境协定及习惯法相关规则在武装冲突期间可继续适用，只要它们不与适用的武装冲突法相抵触。对非武装冲突当事国(如邻国)具有约束力以及涉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如公海)的保护环境义务不受武装冲突存在的影响，只要这些义务不与适用的武装冲突法相抵触”。³⁰⁸

80. 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国际环境法，无论是习惯国际环境法还是协定国际环境法，都继续在占领局势下发挥一定作用。鉴于委员会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专题的工作针对一般性武装冲突，国际法院在核武器合法性案中重点关注“具有毁灭地球上一切文明和整个生态系统的潜力”的武器使用问题，³⁰⁹ 而占领局势可能有时接近于和平时期情况，则情况更是如此。与人权法情况类似，在和平时期法律的适用性方面，也有理由对占领阶段和现行敌对行动阶段做出区分。

B. 尽职

81. 就习惯国际环境法而言，载于 1972 年《斯德哥尔摩宣言》原则二十一以及 1992 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原则 2 的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的责任具有核心意义。³¹⁰ 它被称为“国际环境法的基石”³¹¹ 和“迄今最为公认的国际环境法原则”。³¹² 这一义务符合尽职概念，³¹³ 有时在国际环境法方面被称为“特雷尔冶炼厂”原则³¹⁴ 或“不损害”原则。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造成损害的义务通常被视为环境保护方面的习惯法。国际法院在核武器案中提到这一原则，指出，各国有一般义务确保在其

³⁰⁶ K. Bannelier-Christakis,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a possibility for adjudic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udies*, vol. 20, No. 2 (2013), pp. 129-145, at p. 140-141; and Dam-de Jong (见上文脚注 128), 第 110-111 页。

³⁰⁷ 从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第 48 条第 1 款(a)项的意义上讲，相关评注第 7 段提到这方面的环境条约。见《200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和更正，第 76-77 段，第 26-143 页，第 126 页。

³⁰⁸ 红十字委员会，《关于武装冲突中环境保护的军事手册和指南准则》(1996 年)，第 5 段。

³⁰⁹ 《核武器咨询意见》，第 35 段。

³¹⁰ 《斯德哥尔摩宣言》(见上文脚注 257)，原则二十一：“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同时亦负有责任，确保在它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致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其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引起损害。”另见《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见上文脚注 66)，原则 2。

³¹¹ Sands and Peel(见上文脚注 197)，第 201 页。

³¹² T. Koivurova, “What is the principle of due diligence?”, in J. Petman and J. Klabbbers (eds.), *Nordic Cosmopolitanism,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for Martti Koskenniemi*,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2003, pp. 341-349, p. 349。

³¹³ 《科孚海峡案，关于初步反对意见的判决书，1948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5 页；国际法协会，国际法尽职问题研究小组，第一次报告(2014 年 3 月)和第二次报告(2016 年 7 月)；T. Koivurova, “Due diligenc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可查阅：www.mpepil.org。

³¹⁴ 《特雷尔冶炼厂(美国、加拿大)案，1938 年 4 月 16 日和 1941 年 3 月 11 日，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三卷，第 1905-982 页。

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尊重其他国家以及本国控制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法院认为，这一义务“目前已成为有关环境的国际法典的一部分”。³¹⁵ 此外，委员会已将这一原则列入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³¹⁶ 根据相关评注，尽职义务作为保护环境不受损害的标准基础，可以追溯到一些国际公约。³¹⁷

82. 关于这一原则在具体占领情况下的适用性，可提及国际法院关于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对各国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其中，法院强调南非在就被占领土行使权力时对其他国家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指出，“对某一领土的实际控制，而不是主权或所有权的合法性，是对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行动承担国家责任的基础”。³¹⁸ 此外，法院在关于乌拉圭河纸浆厂案³¹⁹ 以及在某些活动案和修建道路案合并案件³²⁰ 的判决中，提到各国有一般义务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尊重其他国家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

83. 委员会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指出，该义务适用于在一国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进行的活动。³²¹ 应当回顾，委员会一直使用这一表述，不仅指一国领土，而且指在国家控制下的其他领土上进行的活动。正如条款草案 1 评注的解释，“这包括一国即使没有法律上的管辖权，却行使事实上的管辖权的各种情况，例如非法干涉、占领和非法吞并。”³²² 因此，占领国必须遵守不损害原则(尽职)，防止对第三国环境造成严重跨界损害，这似乎有坚实的依据。

84. 习惯国际环境法的“不损害”或尽职原则仅适用于高于某一临界值的损害，通常表示为“重大损害”，³²³ 这是一项行为义务，要求国家采取一切按照合理预期该国应采取的措施。³²⁴ 委员会阐述了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责任所涉尽职义务的主要因素，具体如下：因此，履行预防责任所涉尽职义务的主要因素，可以说是这样的：有关注意程度是一个良好政府应该做到的程度。它应该拥有一个法律体系和足够的资源来维持一个适当的行政管理机构，以控制和监测活动的进行。但是，据理解，经济高度发达、人力物力资源高度开发、管理系统和结构

³¹⁵ 《核武器咨询意见》，第 29 段。另见 Sands and Peel (上文脚注 197)，第 206 页以及 U. Beyerlin, “Different types of norm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Policies, principles and rules”, in D. Bodansky, J. Brunnée and E. He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426-448, p. 439.

³¹⁶ 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第 3 条：“起源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预防重大的跨界损害或随时尽量减少这种危险”，《200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和更正，第 144-170 页，第 78-98 段。

³¹⁷ 同上，第 3 条评注，第 8 段。

³¹⁸ 《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对各国的法律后果》(见上文脚注 141)，第 54 页，第 118 段。

³¹⁹ 《乌拉圭河纸浆厂(阿根廷诉乌拉圭)》，判决，201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4 页，第 101 段。

³²⁰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以及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公路(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判决，201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65 页。

³²¹ 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第 2 条(用语)评注，第 10 段。

³²² 同上，条款草案 1 评注，第 12 段。

³²³ 例如，见 Koivurova, “Due diligence”(上文脚注 313)，第 23 段。

³²⁴ 国际法协会，第二次报告(见上文脚注 313)，第 8 页。

也高度发展的国家所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与上述各因素不那么到位的国家所应达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即使是后者的情况下，也应该保持警惕、使用基础设施并且监测国家领土内进行的危险活动，这是任何政府的自然属性。³²⁵

85. 虽然，是否能够要求作为临时管理机构的占领国达到“良好政府”的标准令人怀疑，但是，按照评注所述，并根据活动的性质，保持最低水平的警惕，可成为占领国预防跨界环境损害义务的核心。

86. 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已在跨界问题方面有了既定地位，并与海域、国际水道、跨界含水层等共享自然资源特别相关。1997年《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³²⁶ 欧洲经委会《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公约》³²⁷ 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³²⁸ 明确载列这项义务。许多区域条约就对河流或湖泊造成的损害规定了相应的预防、合作、通知或赔偿义务。³²⁹ 这一原则也在国际和区域判例中得到确认和澄清。³³⁰

87. 如上所述，占领国在某个陆地领土建立的权力延伸至毗邻海域以及上方大气空间。³³¹ 根据这样的权力，可以认为，至少在整个国家的领土被占领期间，占领国也须(临时地)恪守与领土主权国家同其他国家分享的水道、湖泊、海域或其他跨界水资源有关的权利和义务。³³² 这包括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以及相关程序性义务。

88. 此外，占领国对第三国的义务问题可能受到中立规则的影响。只要现行敌对行动继续，在武装冲突、包括占领局势结束前，中立规则继续适用。³³³ 中立国领土不可侵犯并受到免遭附带损害的保护。³³⁴ 应当指出，这种保护是绝对的，而尽职这一行为义务仅要求一国考虑到其能力，做出最大努力。与此同时，尽职意味着，

³²⁵ 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第3条评注，第(17)段。

³²⁶ 第7条。

³²⁷ 第2条。

³²⁸ 第一九四条第(2)款。

³²⁹ 例如，见《保护莱茵河公约》(1999年)、《关于共有赞比西河系环境友好型管理的行动计划协定》(1987年)以及《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1995年)，均可查阅：www.ecolex.org。另见修订的《大湖水质协定》(2013年，美国、加拿大)，可查阅：<https://ijc.org>。

³³⁰ 国际法院澄清环境义务的数个案件与利用和保护湿地、河流等水资源有关；如修建道路案(见上文脚注320)和纸浆厂案(见上文脚注319)以及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案(见上文脚注201)。另见《印度河基申甘加工程仲裁案，第2011-1号案，2013年12月20日》，常设仲裁法院，第449-450段。各种区域判例可查阅www.ecolex.org。

³³¹ 见上文第21段。

³³² Benvenisti, “Water conflicts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Iraq” (见上文脚注128)。

³³³ M. Bothe, “The law of neutrality”, in D. Fleck (ed.), *Th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49-580, at pp. 559-560。关于中立期限的不一致作法，见 P. Hostetter and O. Danai, “Neutrality in land warfar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可查阅：www.mpepil.com。

³³⁴ Bothe(上文脚注)，第559-560页。

对非国家行为体自身的行为缺乏警惕会引起责任。应当回顾，国际法院确认，乌干达作为占领国，对反叛团体实施的掠夺和抢掠行为负有“警惕义务”。³³⁵

89. 虽然尽职(或预防)原则所附环境义务通常只适用于跨界情况，³³⁶ 但是，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即占领国对被占领土内达到掠夺程度的环境破坏活动负有类似义务，当此类活动由私人行为体实施时也是如此。³³⁷ 国际法协会同样得出结论：“占领国(……)在其占领的领土内负有尽职义务，义务范围根据行使控制的程度而有所不同”。³³⁸ 根据《里约宣言》，“受压迫、遭统治和被占领的人民，其环境和自然资源应予保护”。³³⁹ 此外，还可提及常设仲裁法院的莱茵铁路(*Ijzeren Rijn*)案，该案的事实不涉及从一国到另一国的跨界环境影响。常设仲裁法院提及国际法院上述有关存在尊重其他国家和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的一般义务的论述，并以类比方式得出结论，即“若一国在另一国领土内行使国际法下的权利，则也适用环境保护考虑因素”。³⁴⁰ 还建议各国应根据人权承诺，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履行应尽职责以预防并消除环境损害。³⁴¹ 所有这些都支持占领国在被占领土内以及在避免跨界损害方面负有环境义务的论点。

C. 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

90. 如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允许占领国开采被占领土自然资源的《海牙章程》第 55 条引发了不同的解释。一般都同意，用益权规则禁止对环境造成重大压力的掠夺性开采，但它对占领国施加的积极义务的界定一直不太清楚。最近，提出了新问题，涉及开采被占领土资源的可持续性。有人建议，根据与自然资源有关的国际法的总体发展，“维护这些产业”的概念必须等同于“可持续利用资源”。³⁴² 还可基于占领国负有确保平民能够获得使他们能够维持生计的资源和手段的人权义务，提出同样的要求。³⁴³

³³⁵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见上文脚注 82)，第 253 页，第 247 段。

³³⁶ 关于跨界损害的定义，见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第 2 条(c)款评注。

³³⁷ 一些作者认为，在武装冲突或占领期间对环境造成的所有重大损害都是如此。例如，见 D. Fleck,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double challenge of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in C. Stahn, J. Iverson and J. S. Easterday (e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itions from Conflict to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03-219. 同样，M. Mason, “The application of warfare ecology to belligerent occupations”, in G. E. Machlis et al., (eds.), *Warfare Ecology: a New Synthesis for Peace and Security*, Dordrecht, Springer, 2011, pp. 155-173.

³³⁸ 国际法协会，第二次报告(见上文脚注 313)，第 18 页。

³³⁹ 《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见上文脚注 66)，原则 23。

³⁴⁰ 莱茵铁路(“*Ijzeren Rijn*”)案(见上文脚注 181)，第 222-223 段。

³⁴¹ 见与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独立专家约翰·诺克斯 2018 年 1 月 24 日的最后报告(A/HRC/37/59)，框架原则 1 和 2，评注，第 5 段。

³⁴² M. Bothe, “The administra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y”(见上文脚注 129)，p. 1467。

³⁴³ 关于义务，见上文第 59 段。关于论点，见 Ferraro, “The law of occupation and human rights law...”(上文脚注 185)，第 282 页。

91.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在涉及渔业和林业的国际法中长期存在的优化使用自然资源或实现最适可持续产量的要求，³⁴⁴ 事实上，这一概念的起源似乎确实接近对占领局势中的用益权概念的传统理解和解释。在这方面，可提及对“保护资产的实质”（作为用益权人权利的前提）的长期理解，以及一种解释，根据该解释，这引起“保护处于用益权下公共资产的长期价值的一般性义务”。³⁴⁵ 至于实际做法，如可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日本的占领，在此期间，占领当局积极促进长期可持续开发鱼类和鲸鱼种群。³⁴⁶

92. 可以说，“优化使用”和“用益权”这两个概念“实为保护原则，旨在合理、谨慎地使用不可再生资源，并永久维护可再生资源的生产力”。³⁴⁷ 保护的主要理由是确保持续的经济效益。“优化使用”概念后来扩大到适用于所有自然资源，在《斯德哥尔摩宣言》³⁴⁸ 和通过《世界大自然宪章》³⁴⁹ 后，其内容也得到深化，因此，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可持续利用”，以涵盖保护环境和生态系统以及子孙后代的利益。可持续发展概念要求采用将开发利益与环境和社会关切问题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办法。³⁵⁰

93. 对可持续发展的要素有几种不同的解释。³⁵¹ 根据一个侧重于自然资源的定义，出现这一概念的国际协定明确体现的可持续发展要素可表述如下：

- 需要保护自然资源，以造福子孙后代(代际公平原则)。
- 旨在以“可持续”、“谨慎”、“合理”、“明智”或“适当”方式开发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原则)。
- “公平”使用自然资源，这意味着，一国的使用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需求(公平使用或代内公平原则)。

³⁴⁴ 见 P. Sands,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fiel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4 (1994), pp. 303-381, p. 306; and N. Schrijver, “The evolu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inception, meaning and status”, *Recueil des Cours*, vol. 329,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8, pp. 215-412, at p. 367.

³⁴⁵ Dichter, 指出这是以色列和美国的共同理解，尽管对用益权的某些其他方面存在分歧(见上文脚注 148, 第 591 页)。

³⁴⁶ 见 B. Jones and H. N. Scheiber, “Fisheries policies and the problem of instituting sustainable management: the case of occupied Japan”, in H. Young and L. Goldman (eds.), *Livelihoods,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Abingdon, Routledge, 2015, pp. 287-306.

³⁴⁷ Schrijver, “The evolution of sustainable...” (见上文脚注 344), 第 367 页。

³⁴⁸ 《斯德哥尔摩宣言》(见上文脚注 257)。

³⁴⁹ 《世界大自然宪章》，A/RES/37/7。

³⁵⁰ 见 T. Kuokkan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making and Diplomacy Review* 2013,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 UNEP Course Series 13, Joensuu, UEF, 2014.

³⁵¹ 获得最普遍接受的定义载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 年)，A/42/427：“满足当代需求而又不危及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 需要确保将环境考虑因素纳入经济和其他发展计划、方案和项目，确保在实施环境目标时考虑到发展需求(一体原则)。³⁵²

94. 可持续发展已在世界各地被公认为一项政策目标。³⁵³ 它已体现在诸多联合国文件³⁵⁴ 和条约³⁵⁵ 中。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关条约条款没有提到可持续发展是一项法律义务，而是各缔约方应在推进自身环境和发展政策的同时努力实现的一项目标。³⁵⁶

95.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也已在国际判例中提到并适用。国际法院在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案和纸浆厂案³⁵⁷ 中提到这一概念，指出调和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中得到了适当体现”。³⁵⁸ 法院对修建道路和某些活动合并案件的裁决进一步补充了对国际环境法的说明，并加强了这种法律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³⁵⁹ 还可以参考南极捕鲸案，据称，法院在该案中“心照不宣地赞同

³⁵² Sands and Peel(见上文脚注 197)，第 218-219 页。关于其他定义，例如见 M.-C. Cordonier Segger and A. Khalaf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w: Principles, Practices, and Prospec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5; V. P. Nanda and G. Pr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2nd ed.,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13, p. 29; P. Birnie, A. Boyle and C. Redgwell,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16-123; and D. Frenc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 Fitzmaurice, D. Ong and P. Merkouris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0, pp. 51-68, at pp. 59-61。

³⁵³ 例如，见《关于成立北极理事会的宣言》，*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35(1996)，p.1382；《关于养护和可持续管理热带森林雅温得宣言》，*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 38 (1999)，p. 783；《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 34 (1995)，p. 864；《关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共有水道的订正议定书》，*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 40 (2001)，p. 321；《欧洲联盟条约》(《里斯本条约》)，*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115/13, 2008 年 5 月 9 日。

³⁵⁴ 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题为《我们希望的将来》的成果文件(2012 年)，[A/RES/66/268](#)；另见《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 年)，[A/RES/70/1](#)。

³⁵⁵ 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国际热带木材协定》；《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据一名作者说，超过 110 项多边条约提及可持续发展。见 V.Bar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nature and operation of an evolutive legal nor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3, No.2(2012), pp.377-400, at p.384。

³⁵⁶ Bar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第 384 页。另见《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上文脚注 66)，原则 21。

³⁵⁷ 纸浆厂案(见上文脚注 319)，第 171、175-77 和 184-189 段。另见威拉曼特里法官的个别意见。

³⁵⁸ 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案(见上文脚注 201)，第 140 段。

³⁵⁹ 见 M.M.Mbengue, “The economic judgments and arbitral awards: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n W.A.Schabas and S.Murphy(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pp.122-142, at pp.127-128; J.Cabrera Medaglia and M. Saldivia Ola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w principles in the Costa Rica v. Nicaragua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M.-C.Cordonier Segger and C.G.Weeramantry(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in the Decisio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1992-2012*, Abingdon, Routledge, 2017, pp.255-265。

保护鲸鱼种群方面的可持续性”。³⁶⁰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国际法院并未承认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国际环境法原则。此外，也在其他法院的一些案件中提到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比如南方蓝鳍金枪鱼案，³⁶¹ 国际海洋法法庭关于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的咨询意见，³⁶² 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中国-稀土案。³⁶³ 在国际法中，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已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最受认可的组成部分。³⁶⁴

96. 国际法协会建议，应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解释条约和习惯国际法规则，除非这样做会与条约的某项明确规定冲突，或者在其他方面不适当。³⁶⁵ 在处理这是否属于《海牙章程》第 55 条所述情况的问题时，可以回顾，用益权是一项不引起占领国具体义务的广泛原则。它历来被解释为是指良好的家务管理，³⁶⁶ 根据这一点，在开采相关资源时，用益权“不得超过必要或通常的水平”。³⁶⁷ 这种标准必然反映采用标准的特定背景，而且似乎与上文讨论的“公民生活”概念一样适于演化解释。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概念可被称为“资源保护、资源保存和资源养护概念以及明智利用、合理利用或最佳可持续产量概念的拓展”，³⁶⁸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等同于现代的用益权。《海牙章程》第 43 条规定的占领国的一般责任也支持在管理和利用被占领土的自然资源时把可持续性作为一个主要因素加以考虑。

97. 可持续发展是国际法律辩论中的一个既定部分。然而，在其确切内容和范围方面，仍然存在问题。至少，根据提及可持续发展的条约，各国必须将环境考虑因素纳入经济发展项目，防止损害环境，并在这方面开展合作。一些条约规定了缔约

³⁶⁰ 《南极捕鲸案(澳大利亚诉日本; 新西兰参加)，判决，201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26 页。另见坎萨多·特林达德法官和查尔斯沃思专案法官的个别意见。引用 M. Szabó,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judg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M.-C. Cordonier Segger and C.G. Weeramantry (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in the Decisio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1992-2012*, Abingdon, Routledge, 2017, pp.266-280, p.278。

³⁶¹ 《南方蓝鳍金枪鱼案(新西兰诉日本; 澳大利亚诉日本)，临时措施，1999 年 8 月 27 日的命令，1999 年国际海洋法法庭案例汇编》。

³⁶² 《担保个人和实体从事“区域”内活动的国家所负责任和义务，案件清单：第 17 号，2011 年 2 月 1 日咨询意见》，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

³⁶³ 中国-稀土、钨和钼出口管理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 AB-2014-3、AB-2014-5、AB-2014-6，世贸组织。

³⁶⁴ 见国际法协会，关于国际法在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促进发展方面的作用委员会，会议报告，2016 年，约翰内斯堡。另见国际法协会，《关于可持续发展国际法的新德里原则》，2002 年 4 月 2 日。

³⁶⁵ “可能看起来破坏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解释应仅在作出其他解释会损害全球法律秩序的基本方面、违背某项公约的确切措词或违反强行法规则的情况下才会优先”，国际法协会，索非亚指导说明 2，2012 年。

³⁶⁶ Stone 称，用益权规则禁止“因浪费或疏忽破坏资本值……，这么做违背良好的资源管理规则”(见上文脚注 121, p.714)。

³⁶⁷ 大不列颠，陆军部，*The Law of War on Land Being Part of the Manual of Military Law*, 1958, section 610。类似观点见 *The Manual of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上文脚注 71), p.303, para.11.86。

³⁶⁸ V.Barral, “National 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见上文脚注 134), p.18。

国要采取的进一步措施。³⁶⁹ 如相关判例明确说明的那样，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考虑可能要求各国采取养护、预防以及在有重大跨界损害风险的情况下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等措施。³⁷⁰ 此类义务很少是绝对的，而是取决于每个案例的具体情况。只要涉及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就应补充说明，针对不同资源有不同的具体义务。

98. 在修建道路和某些活动案中，有人询问环境义务是否会受紧急状态影响：“紧急情况是否可以免除一国根据国际法承担的开展环境影响评估的义务或推迟履行这项义务，直至紧急情况停止”。³⁷¹ 虽然法院没有对是否存在此类紧急情况豁免采取立场，这个问题关系到占领局势。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的要求如何在占领局势下付诸实践，这显然取决于具体情况，比如占领的性质以及任何开采项目的持续时间、程度和重要性。此外，占领国的行动不应干涉领土国决定其开采被占领土自然资源的环境和发展政策的主权权利。³⁷² 从这个意义上说，并提及对用益权概念的既定理解，占领国在开采不可再生资源方面应谨慎行事，不应超过占领前的生产水平。开采可再生资源时应确保其长期利用和资源的再生能力。

四. 拟议原则草案

99. 综上所述，现提出以下原则草案：

第四部分

原则草案 19

1. 占领国在管理被占领土过程中，包括在管理领土国有权行使主权权利的任何毗邻海域的过程中，应考虑到环境因素。
2. 占领国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应尊重被占领土的环境保护立法。

原则草案 20

占领国在管理被占领土的自然资源时应确保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损害。

原则草案 21

占领国应利用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确保被占领土内的活动不对另一国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造成重大损害。

³⁶⁹ Bar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见上文脚注 355), p. 393。

³⁷⁰ 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案(见上文脚注 201)、纸浆厂案(见上文脚注 319)、修建道路(见上文脚注 320)和某些活动案(见上文脚注 320)以及关于责任和义务的咨询意见(见上文脚注 362)。相关程序性义务还可能包括通知和合作。

³⁷¹ 修建道路(见上文脚注 320)和某些活动案(见上文脚注 320)，第 158 段。

³⁷² 《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见上文脚注 66)，原则 2：“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拥有按照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资源的主权权利”。另见 Dam-de Jong，他指出，该原则“使各国有很大余地来决定什么是可持续的，什么不是”(见上文脚注 128，第 118 页)。

五. 今后的工作

A. 将在第二次报告中讨论的问题

100. 第二次报告应于 2019 年提交, 将讨论某些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问题, 包括涉及自然资源的国际规则和做法如何在此类武装冲突期间和之后加强环境保护, 以及某些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损害所涉责任和赔偿责任的问题。此外, 还将考虑与合并一整套原则草案有关的问题, 包括术语的使用和序言问题。特别报告员希望这项工作将为 2019 年一读时完成本专题提供充分的依据。

B. 与完成本专题工作有关的其他问题

101. 迄今处理本专题的总体办法是从时间角度讨论武装冲突: 之前、期间和之后。第一部分所载原则草案涉及武装冲突爆发之前的环境保护。一些原则草案更具有普遍性, 与所有三个时间段都相关。原则草案的第二部分涉及武装冲突期间的环境保护, 第三部分涉及武装冲突之后的环境保护。有几句话可能是为了解释分时段办法如何能适用于占领局势, 据称占领局势构成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阶段。

102. 占领开始时, 武装冲突未必也恰好同时开始, 现行敌对行动停止时, 占领也未必同时终止。稳定的占领与冲突后局势有许多共同特点, 甚至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到近似和平时期的条件。虽然长期占领仍须遵从占领法, 但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等其他法律的贡献可能越来越重要。不过, 占领也可能不稳定, 易发生冲突。一方面, 占领与武装冲突之间可能存在类似之处, 另一方面, 占领与冲突后局势也可能存在类似之处, 这取决于占领的性质。

103. 因此, 在现有原则草案与占领局势的相关性方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第一部分所载原则而言, 它们与占领局势的相关性似乎不存在疑问。第一部分所载原则草案(比如指定保护区)的基本前提是采取拟议措施, 以在爆发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加强环境保护。这种武装冲突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占领。占领期间一段段时间的密集敌对行动遵从开展敌对行动的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 第二部分中涉及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原则草案照此可适用。此外, 被占领土的环境继续享有根据适用的国际法, 特别是原则草案 9 反映的武装冲突法在武装冲突期间为自然环境提供的一般保护。不过, 就第三部分而言, 似乎更谨慎的做法是逐案评估拟议原则对冲突后局势的相关性。应考虑的因素涉及占领的性质, 以及占领法的制约。

104. 初步建议, 第三部分所载以下原则草案与占领局势尤其相关。没有为原则草案提出新的措辞, 但有人建议, 在某些情况下, 在相关评注中澄清原则草案与占领局势的关系, 可能会有帮助。以下原则草案可能属于这种情况:

- 原则草案 6(保护土著人民的环境)第 2 段。这一原则并非作为一项法律义务拟订, 作为占领国根据《海牙章程》第 43 条作出的恢复和维持被占领土内公共秩序和公民生活的部分努力, 可能对占领国相关。

- 原则草案 15(武装冲突后的环境评估与补救措施)。这项原则草案的一般措词比较宽泛，足以包括占领国可能采取的措施。此外，它并不意味着存在一项法律义务。如占领国能够促进冲突后环境评估或补救措施，则可鼓励占领国合作。
- 原则草案 16(战争残留物)。这项原则草案明确提到一国管辖或控制的地区，因此似乎涵盖占领局势。
- 原则草案 17(海上战争残留物)。这项原则草案笼统地提及国家，这反映了海上战争残留物可能对环境构成危险的不同法律状况：某一特定国家可能对残留物所在地区拥有主权、管辖权、主权和管辖权、或者既没有主权也没有管辖权。这类残留物也可能位于占领国控制的海域。
- 原则草案 18(共享与准许获取信息)。虽然占领国是否有能力共享或准许获取信息显然取决于安全局势，但第 2 段载有一个例外，涉及安全关切。

六. 参考书目选编

ABOUALI, Gamal

“Natural resources under occupation: the status of Palestinian water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Pac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10, No. 2, 1998, pp. 411-574.

ABU-EID, Abdallah

“Water as human right: the Palestinian Occupied Territories as 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vol. 23, No. 2, 2007, pp. 285-301.

ACEVEDO, Mariana T.

“The inters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New York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vol. 8, 2000, pp. 439-496.

ALAM, Shawkat et al.,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bingdon, Routledge, 2013, pp. 70-76.

ALFREDSSON, Gudmundur and Alexander OVSIOUK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0, 1991, pp. 19-28.

ALSTON, Philip and Katarina TOMASEVSKI, eds.

The Right to Food.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84.

ARAI-TAKAHASHI, Yutaka

The Law of Occupa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9.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n Andrew Clapham, Paola Gaeta and Marco Sassòli, eds., *The 1949 Geneva Conventions,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515-1534.

D’ASPREMONT, Jean and Elodie TRANCHEZ

“The quest for a non-conflictual co-existenc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humanitarian law: which role for the *lex specialis* principle?”, in R. Kolb and G. Gaggioli,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3, pp. 223-250.

BANNELIER-CHRISTAKIS, Karin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a possibility for adjudic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udies*, vol. 20, No. 2, 2013, pp. 129-145, at pp. 140-141.

BARRAL, Virgini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nature and operation of an evolutive legal nor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3, No. 2, 2012, pp. 377-400, at p. 384.

“National 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 Morgera and K. Kulovesi,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Natural Resourc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6, pp. 3-25.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Essai sur les incidences juridiques d’une norme évolutive. Brussels, Bruylant, 2016.

- BENVENISTI, Eyal
“Water conflicts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Iraq”,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7, 2003, pp. 860–872.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Occupation.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BEYERLIN, Ulrich
“Umweltschutz und Menschenrechte”, *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vol. 65, 2005, pp. 525–542.
“Different types of norm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Policies, principles and rules” in Daniel Bodansky, Jutta Brunnée and Ellen He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426–448.
- BIRNIE, Patricia, Alan BOYLE and Catherine REDGWELL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BOISSON DE CHAZOURNES, Laurence
Fresh Water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BOON, Kristen E.
“The future of the law of occupation”, *Canad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6, 2008, pp. 107–142.
- BORGHI, Marco and Letizia POSTIGLIONE BLOMMESTEIN, eds.
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and Access to Justice. Brussels, Bruylant, 2006.
- BOSELMANN, Klaus
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ility. Farnham, Ashgate, 2008.
- BOTHE, Michael
“The law of neutrality”, in Dieter Fleck, ed., *Th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47–580.
“The administra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y”, in Andrew Clapham, Paola Gaeta and Marco Sassòli, eds., *The 1949 Geneva Conventions: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455–1484.
- BOUVIER, Antoine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ime of armed conflict”,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vol. 31, No. 285, 1991, pp. 574–582.
- BOYD, David R.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Revolution: a Global Study of Constitutions,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Armidale, UCB Press, 2011.
- BOYLE, Alan E. and Michael R. ANDERSON, eds.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BOYLE, Alan and David FREESTONE, eds.
International Law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s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BRATSPIES, Rebecca and Russell MILLER, eds.
Transboundary Harm in International Law: Lessons from the Trail Smelter Arbit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BRUCH, Carl, Carroll MUFFETT and Sandra S. NICHOLS, eds.
Governanc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Abingdon, Routledge, 2016.

CABRERA MEDAGLIA, Jorge and Miguel SALDIVIA OLA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w principles in the Costa Rica v. Nicaragua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M.-C. Cordonier Segger and C. G. Weeramantry, 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in the Decisio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1992–2012*, Routledge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bingdon, Routledge, 2017, pp. 255–265.

CARCANO, Andrea

The Transforma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 Brill, 2015.

CASSESE, Antonio

“Powers and duties of an occupant in relation to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Emma Playfair, 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ies: Two Decades of Israeli Occupation of the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19–442.

CERONE, John

“Human dignity in the line of fire: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during armed conflict, occupation, and peace operations”,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 39, 2006, pp. 1447–1610.

CLAGETT, B. M. and O. T. JOHNSON, Jr.

“May Israel as a belligerent occupant lawfully exploit previously unexploited oil resources of the Gulf of Suez?”,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2, No. 3, 1978, pp. 558–585.

CLAPHAM, Andrew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 Andrew Clapham, Paola Gaeta and Marco Sassòli, eds., *The 1949 Geneva Conventions,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701–735.

CONCA, Ken

An Unfinished Found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ORDONIER SEGGER, Marie-Claire and Ashfaq KHALF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w: Principles, Practices, and Prospec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CORDONIER SEGGER, Marie-Claire and C. G. WEERAMANTRY, 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in the Decisio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1992-2012. Abingdon, Routledge, 2017.

CRAWFORD, Emily and Alison PER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CUMMINGS, Edward R.

“Oil resources in occupied Arab territories under the law of belligerent occup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Economics*, vol. 9, No. 3, December 1974, pp. 533-593.

CUYCKENS, Hanne

“Is Israel still an occupying power in Gaza?”,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63, 2016, pp. 275–297.

Revisiting the Law of Occupation. Leiden, Brill/Nijhoff, 2017.

DAM-DE JONG, Daniëlla

International Law and Governance of National Resources i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itu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DAS, Onit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ecurity and Armed Conflict: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3.

DENNIS, Michael J.

“Application of human rights treaties extraterritorially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and military occu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9, 2005, pp. 119-141.

DESGAGNE, Richard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values in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9, 1995, pp. 263–294.

DICHTER, Harold

“The legal status of Israel’s water policie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5, 1994, pp. 565–594.

DIENELT, Anne

“‘After the war is before the war’: the environment, preventive measure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ir post-conflict impact”, in Carsten Stahn, Jens Iverson and Jennifer S. Easterday, e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itions from Conflict to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420–437.

DINSTEIN, Yoram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Belligerent Occup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DÖRMANN, Knut and Hans-Peter GASSER

“Protection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in Dieter Fleck, ed., *Th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31-320.

ENGELAND, Anicée Van

“Protection of public property”, in Andrew Clapham, Paola Gaeta and Marco Sassòli, eds., *The 1949 Geneva Conventions*,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535–1550.

FEILCHENFELD, Ernst H.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of Belligerent Occupat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42.

FERRARO, Tristan

“Determining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an occup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4, No. 885, 2012, pp. 139–163.

“The law of occupation and human rights law: some selected issues”, in R. Kolb and G. Gaggioli,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3, pp. 273–293.

(ed.), *Occupation and Other Forms of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Territory: Report of an Expert Meeting*. ICRC, 2012.

FLECK, Dieter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double challenge of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in Carsten Stahn, Jens Iverson and Jennifer S. Easterday, e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itions from Conflict to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03–219.

FITZMAURICE, Malgosia

“Some reflections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 as a human right in international law”, *Non-State 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 2, 2002, pp. 1-22.

“The human right to water”, *Fordham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18, 2007, pp. 537–585.

FITZMAURICE, Malgosia and Jill MARSHALL

“The human right to a clean environment — phantom or realit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d English courts perspective on balancing rights in environmental cases”,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6, 2007, pp. 103–151.

FOX, Gregory H.

“Exit and military occupations”, in R. Caplan, ed., *Exit Strategies and State Build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97–223.

“Transformative occupation and the unilateralist impuls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4, No. 885, 2012, pp. 237–266.

FRANCIONI, Francesco and Tullio SCOVAZZI, ed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Harm. London, Graham & Trotman, 1991.

FREESTONE, David and Freedom-Kai PHILLIP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LOSC)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urisprudence”, in Marie-Claire Cordonier Segger and C. G. Weeramantry, 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in the Decisio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1992–2012*. Abingdon, Routledge, 2017, pp. 319–338.

FRENCH, Dunc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algosia Fitzmaurice, David Ong and Panos Merkouris,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0, pp. 51–68.

GAVOUNELI, Maria

“Access to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elimitation of a right”, *Tulane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vol. 13, 2000, pp. 13–30.

GEHRING, Markus and Alexandre GENEST

“Dispute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WTO regime”, in Marie-Claire Cordonier Segger and C. G. Weeramantry, 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in the Decisio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1992–2012*. Abingdon, Routledge, 2017, pp. 357–383.

GERSON, Allen

“Off-shore oil exploration by a belligerent occupant: the Gulf of Suez disput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1, 1977, pp. 725–733.

GIACCA, Gilles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occupied territories”, in Andrew Clapham, Paola Gaeta and Marco Sassòli, eds., *The 1949 Geneva Conventions,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485–1514.

GLAHN, Gerhard von

The Occupation of Enemy Territory: a Commentary on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Belligerent Occupation.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7.

GREAR, Anna and Louis J. KOTZE,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5.

GREENWOOD, Cristoph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Emma Playfair, 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ies: Two Decades of Israeli Occupation of the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GROSS, Ayeal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Rethinking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Occup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The righting of the law of occupation”, in Nehal Bhuta, ed., *The Frontiers of Human Rights: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ts Challen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1-54.

HALL, Matthew

Victims of Environmental Harm: Rights, Recognition and Redress unde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Routledge, 2013.

HANDL, Günther

“Human rights and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 mildly ‘revisionist’ view”, in Antonio Cançado Trindade, ed.,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tituto Interamericano de Derechos Humanos, 1992, pp. 117–142.

“Human rights and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Asbjørn Eide, Catharina Krause and Allan Rosas, eds.,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2nd rev. ed.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2001, pp. 303–328.

“Transboundary impacts”, in Daniel Bodansky, Jutta Brunnée and Ellen He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531–549.

HANQIN, Xue

Transboundary Damage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HEINTSCHEL VON HEINEGG, Wolff

“The rule of law i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ituations: factors in war and peace transitions”,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vol. 27, 2004, pp. 843–876.

HENCKAERTS, Jean-Marie and Louise DOSWALD-BECK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Rules, vol. I. ICRC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HULME, Karen

“Taking car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gainst damage: a meaningless oblig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2, No. 885, 2010, pp. 675–691.

“Using a framework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for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mediation”, in Carsten Stahn, Jens Iverson and Jennifer S. Easterday, e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itions from Conflict to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19–142.

(ed.), *Law of the Environment and Armed Conflict*.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7.

JENSEN, David and Steve LONERGAN, eds.

Assessing and Restoring Natural Resources in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Abingdon, Routledge, 2012.

JESSUP, Philip C.

“A belligerent occupant’s power over prop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8, No. 3, 1944, pp. 457–461.

JHA, U.C.

Armed Conflict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Pvt Ltd, 2014.

JONES, Benjamin and Harry N. SCHEIBER

“Fisheries policies and the problem of instituting sustainable management: the case of occupied Japan”, in Helen Young and Lisa Goldman, eds., *Livelihoods,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Abingdon, Routledge, 2015, pp. 287-306.

KISS, Alexandre Charles, and Diane SHELT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3rd ed.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2004.

KOIVUROVA, Timo
“What is the principle of due diligence?”, in Jarna Petman and Jan Klabbers, eds., *Nordic Cosmopolitanism,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for Martti Koskenniemi*.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2003, pp. 341–349.

KOLB, Robert and Sylvain VITÉ
Le droit de l’occupation militaire. Perspectives historiques et enjeux juridiques actuels. Brussels, Bruylant, 2009.

KOUTROULIS, Vaios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 situation of prolonged occupation: only a matter of tim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4, No. 885, 2012, pp. 165–205.

KRAUSE, Catarina, Allan ROSAS and Asbjørn EIDE, eds.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 Textbook. 2nd ed. Leiden, Martin Nijhoff, 2012.

KUOKKANEN, Tuom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making and Diplomacy Review 2013*. UNEP Course Series 13. Joensuu,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 2014.

LANG, Winfried, 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95.

LANGENKAMP, R. Dobie, and R. J. ZEDALIS
“What happens to the Iraqi oil?: Thoughts on some significant, unexamined international legal questions regarding occupation of oil field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4, No. 3, 2003, pp. 417–435.

LAUTERPACHT, Elihu
“The Hague Regulations and the seizure of munitions-de-guerr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2, 1955, pp. 218–226.

LEFEBER, René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Interference and the Origin of State Liability. The Hague, Kluwer International Law, 1996.

LEIB, Linda Hajjar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Philosophical, Theoretic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11.

LEIGH, M.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 on law on Israel’s right to develop oil fields in Sinai and the Gulf of Suez”,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 16, No. 3, 1977, pp. 733–753.

LINDROOS, Anja
“Addressing norm conflicts in a fragmented legal system: the doctrines of *lex specialis*”,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4, 2005, pp. 27–66, at p. 44.

LONGOBARDO, Marco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iolations by private actors in occupied territories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63, 2016, pp. 251–274.

LUBELL, Noam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in military occup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4, No. 885, 2012, pp. 317–337.

LUJALA, Päivi and Siri Aas RUSTAD, eds.

High-Valu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Abingdon, Earthscan, 2012.

MASON, Michael

“The application of warfare ecology to belligerent occupations”, in Gary E. Machlis, et al., eds., *Warfare Ecology: a New Synthesis for Peace and Security*. Dordrecht, Springer, 2011, pp. 155–173.

MATAR, Ibrahim

“Exploitation of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for Jewish colonie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in Emma Playfair, 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ies: Two Decades of Israeli Occupation of the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43–460.

MBENGUE, M. M.

“The economic judgments and arbitral awards: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n William A. Schabas and Shannonbrooke Murphy,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pp. 122–142.

MCCAFFREY, Stephan

“A human right to wate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view*, vol. 5, No. 1, 1992, pp. 1–24.

MCDOUGAL, Myres S. and Florentino P. FELICIANO

Law and Minimum World Public Order: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erc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MILANO, Enrico

“Occupation”, in André Nollkaemper and Ilias Plakokefalos, eds., *The Practice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Shared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MILANOVIC, Marko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Human Rights Treaties, Law, Principles and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human right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in Thomas Gammeltoft-Hansen and Jens Vedsted-Hansen, eds., *Human Rights and the Dark Side of Globalisation: Trans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and Migration Control*.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MOLLARD-BANNELIER, Karine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n temps de conflit armé. Paris, Pédone, 2001.

MOMTAZ, Djamchid

“Les règles relatives à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au cours des conflits armés à l'épreuve du conflit entre l'Irak et le Koweït”,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37, 1991, pp. 203–219.

- MREMA, Elizabeth Maruma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an Inventory and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Nairobi, UNEP, 2009.
- MURPHY, Sean D., Won KIDANE and Thomas R. SNIDER
Litigating War: Arbitration of Civil Injury by the Eritrea–Ethiopia Claims Commi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NANDA, Ved P. and George (Rock) PR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2nd ed.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13.
- NIFOSI-SUTTON, Ingrid
The Protection of Vulnerable Group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London, Routledge, 2017.
- OHLIN, Jens David, ed.
Theoretical Boundaries of Armed Conflict and Human Righ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OKOWA, Phoebe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in Jonas Ebbesson and Phoebe Okowa, eds., *Environmental Law and Justice in Contex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OPPENHEIM, Lassa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vol. II, War and Neutrality. 2nd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2.
- OTTOLENGHI, Michael
“The stars and stripes in Al-Fardos squ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belligerent occupation”, *Fordham Law Review*, vol. 72, No. 5, 2004, pp. 2177–2218.
- PAVONI, Ricardo
“Environmental jurisprudence of the European and Inter-American Courts of Human Rights: comparative insights”, in Ben Boer, *Environmental Law Dimensions of Human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69–106.
- PAYNE, Cymie R.
“Legal li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the United Nations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and the 1990–1991 Gulf War”, in Carl Bruch, Carroll Muffett and Sandra S. Nichols, eds., *Governanc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Abingdon, Routledge, 2016, pp. 719–760.
- PEJIĆ, Jelena
“The right to food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the leg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83, No. 844, 2001, pp. 1097–1109.
- RADICS, Olivia and Carl BRUCH
“The law of pillage, conflict resources, and jus post bellum”, in Carsten Stahn, Jens Iverson and Jennifer S. Easterday, e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itions from Conflict to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43–168.
- RAYFUSE, Rosemary, ed.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Approaches to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Relation to Armed Conflict. Leiden, Brill/Nijhoff, 2014.

ROBERTS, Adam

“What is military occupation”,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5, No. 1, 1985, pp. 249–305.

“Prolonged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Israeli-occupied territories since 196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4, 1990, pp. 44–103.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the experience of the 1991 Gulf War”, in Richard J. Grunawalt, John E. King and Ronald S. McClain, eds.,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s.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vol. 69.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1996, pp. 222–277.

“The law of war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7–86.

“Transformative military occupation: applying the laws of war and human right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0, 2006, pp. 580–622.

SANDS, Philippe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fiel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4, 1994, pp. 303–381.

SANDS, Philippe, and Jacqueline PEE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4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SASSÒLI, Marco

“Legis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and civil life by occupying Power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6, No. 4, 2005, pp. 661–694.

“The concept and beginning of occupation”, in Andrew Clapham, Paola Gaeta and Marco Sassòli, eds., *The 1949 Geneva Conventions,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389–1419.

SAUL, Ben

“The status of Western Sahara as occupied territory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Global Change, Peace and Security*, vol. 27, No. 3, 2015, pp. 301–322.

SCHEFFER, David J.

“Beyond occupation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7, 2003, pp. 842–860.

SCHMITT, Michael N.

“Green war: an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2, No. 1, 1997, pp. 1–109.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fault lines in the prescriptive landscape”, in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87–136.

SCHRAM, Gunnar G.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1, 1992, pp. 141–150.

SCHRIJVER, Nico

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s, Balancing Rights and Du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The evolu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inception, meaning and status”,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vol. 329.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8, pp. 215–412.

SCOBIE, Iain

“Natural resources and belligerent occupation: mutation through permanent sovereignty”, in Stephen Bowen, ed., *Human Rights, Self-Determin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 pp. 221–290.

“Natural resources and belligerent occupation: 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nd human rights law”, in Susan M. Akram,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a Rights-based Approach to Middle East Peace*. Abingdon, Routledge, 2011.

SHANY, Yuval

Faraway, so Close: the Legal Status of Gaza, after Israel’s Disengagement. Research Paper No. 12–06.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2006.

SHELTON, Dinah

“Human rights,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the right to the environment”, *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1, pp. 103–137.

“What happened in Rio to human right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3, 1992, pp. 75–107.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what specific environmental rights have been recognized?”,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vol. 35, 2006, pp. 129–171.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substantive rights”, in Malgosia Fitzmaurice, David Ong and Panos Merkouris,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0.

SHELTON, Dinah L. and Isabel CUTTING

“If you break it, do you own it? Legal consequences of environmental harm from military activi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egal Studies*, vol. 6, 2015, pp. 201–246.

SJÖSTEDT, Britta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Relation to Armed Conflict. The Role of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Lund University, 2016.

“The 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treaties 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post-conflict”, in Carsten Stahn, Jens Iverson and Jennifer S. Easterday, e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itions from Conflict to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73–92.

SOROETA, Juan

“The conflict in Western Sahara after forty years of occupation: international law versus realpolitik”,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9, 2016, pp. 187–221.

SPIEKER, Heike

Völkergewohnheitsrechtlicher Schutz der natürlichen Umwelt im internationalen bewaffneten Konflikt. Bochum, UVB-Universitätsverlag Dr. N. Brockmeyer, 1992.

STAHN, Carsten, Jens IVERSON and Jennifer S. EASTERDAY, e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itions from Conflict to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STEFANIK, Kirsten

“The environment and armed conflict: employing general principle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in Carsten Stahn, Jens Iverson and Jennifer S. Easterday, e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itions from Conflict to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93–118.

STEWART, James G.

Corporate War Crimes. Prosecuting Pillage of Natural Resources.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2011.

STONE, Julius

Legal Control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 Treatise on the Dynamics of Disputes and War-Law. London, Stevens and Sons Limited, 1954.

STRYDOM, Henni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troversies in the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in Marie-Claire Cordonier Segger and C. G. Weeramantry, 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in the Decisio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1992-2012*. Abingdon, Routledge, 2017, pp. 470–490.

SZABÓ, Marce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judg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Marie-Claire Cordonier Segger and C. G. Weeramantry, 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in the Decisio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1992–2012*. Abingdon, Routledge, 2017, pp. 266–280.

THORME, M.

“Establishing environment as human right”,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 19, 1991, pp. 301–342.

TIGNINO, Mara

“Wate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2, No. 879, 2010, pp. 647–674.

“The legal regime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and its weaknesses”, in Yann Kerbrat and Sandrine Maljean-Dubois,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11.

Water During and After Armed Conflicts, What Prote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 Brill, 2017.

TLADI, Dire

“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case concerning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 in Marie-Claire Cordonier Segger and C. G. Weeramantry, 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in the Decisio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1992-2012*. Abingdon, Routledge, 2017, pp. 242–254.

TOMASEVSKI, Katarina, ed.

The Right to Food: Guide through Applicable International Law.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87.

TROPP, H. and A. JÄGERSKOG

Water Scarcity Challeng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Water Institute, 2006.

VIÑUALES, Jorge E.

“A human rights approach to extraterritori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 assessment”, in Nehal Bhuta, ed., *The Frontiers of Human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77–220.

VITÉ, Sylvain

“The interrelation of the law of occupation and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the examples of food, health and proper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0, No. 871, 2008, pp. 629–651.

WATES, Jeremy and Seita ROMPPAINEN

“The Aarhus Convention: a legally binding framework promoting procedural environmental rights”, in Tuula Honkonen and Ed Couzens, ed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making and Diplomacy Review 2009*. Joensuu,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 2010.

WEBER, Stefa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n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Law Journal*, vol. 12, 1991, pp. 177–185.

WEIR, Doug

“Reframing the remnants of war: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governments, and civil society”, in Carsten Stahn, Jens Iverson and Jennifer S. Easterday, e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itions from Conflict to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438–455.

WILMSHURST, Elizabeth, and Susan BREAU, eds.

Perspectives on the ICRC Study o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ZAHRADNIKOVA, Eva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giving the green light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Queen Mary Law Journal*, vol. 8, 2017, pp. 13–25.

ZARSKY, Lyuba, ed.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Conflicts and Norm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London, Earthscan, 2002.

附件

国际法委员会或起草委员暂时通过的原则草案综合清单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问题原则草案³⁷³

导言

原则草案 1

范围

本文所述原则草案适用于武装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环境* 保护。

原则草案 2

宗旨

本文所述原则草案旨在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武装冲突期间对环境损害的预防措施以及通过补救措施，加强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

第一部分

总则

原则草案 4

加强环境保护的措施

1. 各国应依照国际法规定的义务，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加强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2. 此外，各国还应酌情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原则草案 5[一-(+)]

指定受保护区

各国应当以协议或其他方式，指定具有重大环境和文化意义的区域为受保护区。

原则草案 6

保护土著人民的环境

1. 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在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土著人民所居住领土的环境。
2. 如武装冲突对土著人民所居住领土的环境造成有害影响，各国应在冲突结束后借助适当程序，特别是通过土著人民自身的代表机构，同有关土著人民开展有效的协商与合作，以便采取补救措施。

* 对全部或部分原则草案来说，“环境”一词更可取，还是“自然环境”一词更可取，将在后一阶段再作讨论。

³⁷³ 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国际法委员会在其第六十八届会议上注意到的原则草案以楷体表示。

原则草案 7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驻军协议

各国和国际组织应酌情将环境保护条款纳入与武装冲突有关的驻军协议。此种条款可包括预防措施、影响评估、恢复和清理措施。

原则草案 8

和平行动

各国和国际组织参加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和平行动，应考虑这些行动对环境的影响，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减轻和补救其造成的不利环境后果。

第二部分

武装冲突期间适用的原则

原则草案 9[二-1]

武装冲突期间对自然环境的总体保护

1. 应按照适用的国际法，特别是武装冲突法，尊重和保护环境。
2. 应注意保护环境免遭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
3. 除非自然环境成为军事目标，否则任何一部分都不得受到攻击。

原则草案 10[二-2]

对自然环境适用武装冲突法

应对自然环境适用武装冲突法，包括关于区分、相称性、军事必要性和攻击中采取预防措施的原则和规则，以期保护环境。

原则草案 11[二-3]

环境因素

适用相称性原则和军事必要性规则时，应考虑环境因素。

原则草案 12[二-4]

禁止报复

禁止作为报复而对自然环境进行攻击。

原则草案 13[二-5]

受保护区

以协议指定为受保护区的具有重大环境和文化意义的地区，只要不包含军事目标，应保护其不受任何攻击。

第三部分

武装冲突后适用的原则

原则草案 14

和平进程

1. 武装冲突各方应解决与恢复和保护因冲突而遭到破坏的环境有关的问题，将之作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包括酌情在和平协议中处理此事。

2. 有关国际组织应酌情在这方面发挥协助作用。

原则草案 15

武装冲突后的环境评估与补救措施

鼓励包括国际组织在内的有关行为方在武装冲突后的环境评估与补救措施方面开展合作。

原则草案 16

战争遗留物

1. 武装冲突后，冲突各方应争取消除其管辖或控制下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有毒和危险的战争遗留物，或使之无害。应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规则采取此类措施。
2. 各方还应争取相互并酌情同他国和国际组织就技术与物资援助达成协议，包括在适当情况下开展联合行动，消除这种有毒和危险的战争遗留物或使之无害。
3. 第 1 和第 2 段不妨碍国际法规定的任何清除、移除、销毁或维护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爆炸性弹药和其他装置之权利和义务。

原则草案 17

海上战争遗留物

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应开展合作，确保海上战争遗留物不对环境构成危险。

原则草案 18

共享与准许获取信息

1. 为便利武装冲突后采取补救措施，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须依照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共享并准许获取相关信息。
2. 本原则草案中并无任何规定要求一国或国际组织必须分享或准许获取对其国防或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信息。但国家或国际组织应诚意合作，根据具体情况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